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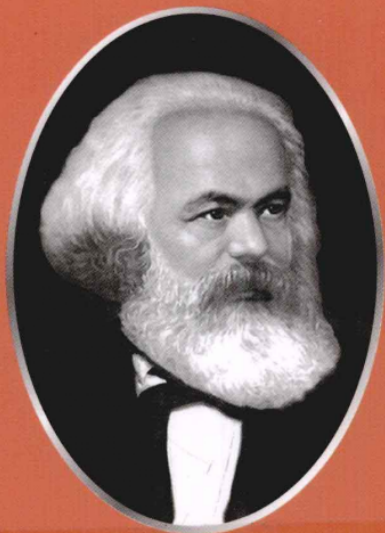
博学文库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丛书

总主编/艾四林

Boxue Wenku

Makesi Zhuyi Jingdian Zhuzuo Dao du Congshu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马克思

王贵贤 田毅松◎编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经典是民族的文化基因 经典是思想的源头活水

权威解读马克思主义产生发展的思想精华与丰富内涵 系统阐释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与哲学思考

经典阅读有资政育人之功效。本套丛书力求从理论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独特层面，重点把握经典作家的思想全貌及其作品的深厚底蕴，以写作背景、成书过程和出版、全书结构、主要内容和观点及其历史影响和当代现实意义等为基础脉络，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进行了原创性的权威解读和剖析，以使读者能系统掌握贯穿经典著作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强化其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观察并分析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社会现实问题的能力，从而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定价：22.00 元

[第一辑] 全套 10 册
总定价 253.00 元

ISBN 978-7-80219-901-9



9 787802 199019 >

博学文库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丛书

总主编/艾四林

Boxue Wenku
Marxism Classic Works Reading Series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导 读

王贵贤 田毅松◎编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导读 / 王贵贤等编著. —北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1.12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丛书 / 艾四林总主编. 第一辑)

ISBN 978-7-80219-901-9

I. ① 1… II. ①王… III. ①马克思著作—手稿—研究 IV. ① A81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39247 号

图书出品人 / 肖启明

出版 统 筹 / 赵卜慧

责 任 编 辑 / 张 霞

书名 /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导读

作者 / 王贵贤 田毅松 编著

出版·发行 /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地址 / 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里 7 号 (100069)

电话 / 010-63292534 63057714 (发行中心) 63055259 (总编室)

传真 / 010-63292534

Http: //www.rendabook.com.cn

E-mail: mzfz@263.net

经销 / 新华书店

开本 / 16 开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印张 / 8.5

字数 / 95 千字

版本 /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刷 / 河北省永清金鑫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 / ISBN 978-7-80219-901-9

定价 / 22.00 元

出版声明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或倒装, 本社负责退换)



读经典 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

艾四林

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课题组首席专家

教育部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分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主任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常务副院长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重大战略决策。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是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重要任务。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就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了全面部署，并明确要求，要引导党员、干部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蕴含和集中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源和基础。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早在1945年的时候，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就提出要读5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要求，到了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要求广大干部要阅读和学习12本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在新世纪新阶段，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仅有助于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增强马克思主义信仰，也有助于从源头上完整准确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和解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实际问题。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在本科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中，虽然没有马克思主义经典导读这样的课程，但教师一般会推荐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作为必读书目，要求学生课下阅读，以加深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认识。在目前的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

系中，“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就是其中的一门重要课程。特别是，对于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的研究生来说，“马克思主义原著研读”更是其必修的核心课程。因而，使青年学生拥有一套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导读性著作，一直是我们着力探索的重要教学科研任务。

如何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毋庸讳言，直接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原始文本，是最好的学习途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可谓卷帙浩繁，仅仅就历史考证版（MEGA2）《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而言，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IMES）就计划出版120卷左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有50卷（53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出齐后将超过60卷，《列宁全集》也有38卷。让作为非专业学者的党政干部和青年学生去读这么多的原著，显然是不现实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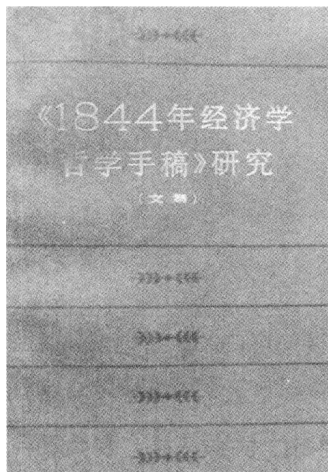
有鉴于此，应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之邀，我们组织了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读”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教学研究的教授为主的编写队伍，对精心挑选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些经典文献进行导读，并分批陆续出版。在编写中，我们强调导读著作风格的通俗性和文风的可读性，要求每本导读著作的字数控制在10万字左右（个别除外），使之介于大部头研究专著和合集之间。目前，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导读性著作的撰写，主要有如下两种形式：一种是把每一本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导读写成一本大部头的专著；另一种是把若干马克思主义经典分章节加以介绍，然后汇成一本合集。相对来讲，前者的优势是研究精深、学术性强，其体例和风格主要适合专家学者，但相对于党政干部和青年学生而言，则显得有些深奥，往往会让读者产生畏难情绪；后者的优势是比较集中、简明扼要，但内容较为单薄，往往会使读者感觉不解渴。因此，我们这套丛书试图寻找更为合适的体例和风格，兼收上述两类导读著作的优点，从而起到积极的探索作用。

我们衷心希望这套丛书有助于广大党政干部和青年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同时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出一点我们应有的贡献。

2011年11月11日于北京清华园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早期最重要的手稿之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正式出版以后，它就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点，不但西方“马克思学”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视为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研究最重要的对象，而且西方马克思主义也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中吸取理论养料。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没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蓬勃发展。如果说罗尔斯《正义论》的发表导致了“罗尔斯产业”一样，那么《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刊行则直接导致了一个哲学流派（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

但是，对于这样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人们对它的看法却并不一致。一方面，很多研究者通常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视为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发源地，而这种所谓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被称为“马克思的第二次降世”。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悉尼·胡克这样写道：“马克思在第二次降世的时候，不是以《资本论》的作者、风尘仆仆的经济学家的姿态出现，也不是以革命的无裤党、具有鼓舞力量的《共产党宣言》的作者出现的。他穿着哲学家和道德家的外衣走出来，宣告关于超越阶级、政党或派别的狭隘界限的人类自由的消息。”^[1]在这些学者看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高峰，而马克思此后的著作所蕴含的思想再也没能达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高度。另一方面，正统马克思主义代表列宁认为《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已经完成了“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重要转变。^[2]根据列宁的这个论述，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部分
国外研究资料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体现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因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写作完成明显要晚于《德法年鉴》时期，既然在《德法年鉴》时期已经完成了这一转变，那么《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应该体现的是马克思转变后的立场。当然，更多的学者仍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视为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中转站，处于“从费尔巴哈走向历史唯物主义”^[3]的关键阶段的重要著作。人们经常说，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历时近40年，毫无疑问，《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正是马克思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点。也正因为它是研究起点，所以有的学者认为，正确理解和科学把握《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思想观点需要从马克思的晚期著作——尤其是《资本论》——的高度来加以审视和考察。如果说《资本论》的研究是对人体进行的解剖，那么《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连“猴体解剖”都算不上。^[4]这就意味着，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阐发的思想是阶段性的，具有不成熟性质。

无论这些观点之间的分歧有多大，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文本。对于马克思的这种内容及其文本结构本身均极富张力的著作，我们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既要理性审慎地看待人们从各自理论背景、阶级立场所作的解读，也要看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一文本的笔记性质；既要体悟马克思感情丰富的社会现实描述，也要把握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深刻的哲学之思。

但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内容的丰富性和理论的复杂性，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面深入分析马克思思想的视角，也让人们在理解

马克思的时候产生了困惑，而且这种困惑是多维度多层次的。最直观的困惑是，马克思的这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文本的编排应该是什么，这些文献学的内容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的思想有没有影响；比较深层次的困惑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内部是不是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主题思想，或者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不是像很多人所认为的那样其中存在着某种所谓的“断裂”，如果有“一以贯之”的思想，那么马克思所使用的诸多概念之间又存在着什么联系；关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深层次问题则涉及了前面所谈及的争论，也就是如何科学评价《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思想，公正看待它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地位问题。

要解决这些困惑，我们必须追随马克思足迹，像他一样坚持用科学公允的态度去回到文本，回到历史深处，回到具体语境之中，走向思想深处。同时，作为一本导读性的著述，我们还要考虑到读者的接受性，既要让读者能够相对比较深入地了解《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丰富内容，也要让读者没有佶屈聱牙之感，去感同身受马克思的思想魅力。

当然，作为马克思的代表作之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自从发表之后就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而且这种关注仍在持续着。相应地，大量关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学术成果也不断涌现出来。所以，本书的写作必须大量借鉴学术界前辈的研究成果，把诸多的优秀成果加以整合并进行介绍。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的研究只不过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进行的一些理论探讨和概括。当然，如果方家认为这个研究确有一些启发，那也只能算是我们的意外收获了。

【注释】

[1]《西方学者论〈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

[2]《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9页。但是韩学本教授对列宁原文的考察，这里所谓的“转变”实际上指的是转变

过程的“最后完成阶段”，也就是说强调的是转变的过程，而不是指转变的完成。另参见韩学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论析》，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页下注。

[3] 黄楠森、施德福、宋一秀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07页。

[4] 关于这一隐喻是马克思在讨论如何分析社会经济形态问题时提出的一种方法，他认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来说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特征，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提供了钥匙。”《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

目录

—• CONTENTS •—

总序 读经典 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 艾四林 /I

引子 /III

第一章 马克思的早期思想发展 /001

一、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 /003

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思想来源 /009

第二章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文本结构及
内容梗概 /023

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文献学研究 /024

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基本内容 /030

第三章 “异化”与私有财产 /055

一、“异化”概念的源流 /056

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 /061

三、《神圣家族》中的异化及资本家的异化 /067

四、“异化”与私有财产之关系 /0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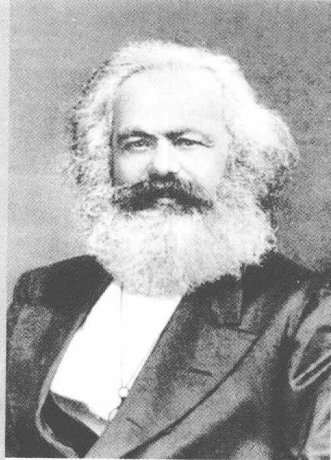
第四章 共产主义与人的解放 /081

一、私有财产与人的问题 /083

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与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 /087

三、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之谜的解答” /093

第五章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影响	/103
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地位	/104
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西方马克思主义： 以“异化”为中心	/108
三、一个经典的文本和一个永远的话题	/117
参考文献	/122



第一章

马克思的早期思想发展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序言”中，马克思打算“用不同的、独立的小册子来相继批判法、道德、政治等等，最后再以一本专门的著作来说明整体的联系、各部分的关系，并对这一切材料的思辨加工进行批判”，因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涉及范围很广，包括“国民经济学同国家、法、道德、市民生活等等的联系”^[1]。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马克思的这些理论设想并没有完全实现^[2]，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内容也只限于“国民经济学本身专门涉及的这些题目的范围”^[3]。

马克思早期思想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那就是他所关注的领域和热点非常广泛。与这一特点相关联的是马克思研究的另外一个特点，即他的研究主题一直处于变动之中，而这种变动一直延续到了“巴黎时期”。马克思变动的最终结果是把研究集中于“政治经济学”领域^[4]，其他相关的研究主题基本上是与政治经济学相关的。而且，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给予了足够的重视，把“完全经验的”国民经济学批判研究与“完全纯粹的、完全决定性的、完全批判的批判”对立起来，认为用这种纯粹思辨的批判来非难“实证的批判者”是一种“极端的无知和思想贫乏”^[5]。

根据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序言”中的陈述，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楚，马克思为什么会转向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研究，并对青年黑格尔派（“完全批判的批判”）进行批判？如果我们把马克思的这种思想转变看作是一种研究方法或研究范式的转换，那么这一问题就成了这种转换的背后隐含的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问题。如果我们进一步推论，这种逻辑还包含着马克思的实证研究与“不学无术的评论家”的“乌托邦的词句”之间的对立

以及马克思对他们的超越。此外，要理解《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丰富内容，还需要在国民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分析马克思的丰富思想来源。

一 | 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

马克思的思想走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过程基本上就是他超越青年黑格尔学派思想水平的过程，也就是其唯物史观形成、发展和由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本部分的重点是描述马克思的思想成长，所以我们将马克思思想发展进行阶段划分，然后对每一阶段马克思的一部或多部著作进行分析，并结合他相应的笔记和书信，对这些作品内容及其写作背景进行概括，进而勾勒马克思是如何一步步走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确立自己的唯物史观做好充分准备的。

我们认为，Г.А.巴加图利亚关于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阶段划分是比较合理的。他将马克思走向唯物史观的过程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是1835年夏到1843年春，巴加图利亚将其称为唯物史观形成的思想准备阶段或前史阶段，在这一阶段马克思的思想基本还处于青年黑格尔派思想的范围之内，虽然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一些潜在的唯物主义倾向，但是还没有开始形成自己的唯物史观。从马克思这一阶段的文献中可以发现，他此时的思想发展变化极快，短短数年就经历了由康德哲学向黑格尔哲学，进而转向青年黑格尔哲学并最终产生自己的唯物史观的重大思想转变。^[6]

马克思出生于一个相对宽松自由的家庭环境中，而且他的中学老师和校长都具有自由主义的启蒙精神，因此他接受了理性主义的教育，初步形成了唯心主义哲学观，我们从他中学时期所作包括《青年选择职业的考虑》在内的三篇文章可窥一斑。但这时他已经模

糊地意识到社会关系在人类生活中的意义。^[7]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能简单认为马克思提到了“社会关系”就认为他这时候的思想已经有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因子”^[8]。我们定位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时，需要遵照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把它放在具体的发展阶段和语境中来分析，看一看他在这个阶段整体上所处的思想水平。此外，我们还应该看到，在马克思早期思想中很多概念与成熟时期是不尽相同的。比如这里提到的社会（关系），这一概念如果说在晚期是指社会关系等，那么早期的社会主要是指黑格尔思辨哲学笼罩下的市民社会。但马克思成熟时期的社会已经是现实的、完全经验的社会，是我们能够感同身受并身处其中的社会，是为我们直接提供了衣食住行等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社会。早期的市民社会是一个来自于古典经济学的概念，而且它在被德国古典哲学家改造之后基本上仍被认为是一种理性的体现，这显然是黑格尔哲学的思路——在理性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意义上来讨论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的。^[9]马克思在早期的其他几篇论文中也大致如此。

马克思在大学期间所学专业是法律。在近代法律思想史上，实证法的合法性问题——也就是法律“是什么”（what it is）和“应当是什么”（what it ought to be）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法学领域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的哲学根源来自于休谟提出来的“是”与“应当”之间的断裂，也就是通常所称的“休谟问题”。一般认为，康德通过对理性的规制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但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的对立……是唯心主义所固有的”，而且康德把问题的最终解决放在了单个的主体身上。与自然科学不一样，这种解决方式对于“法、国家、自然界、全部哲学”等社会科学领域来说并不完全合适，因此他逐渐从曾经吸取营养的“康德、费希特的理想主义”转向了现实。^[10]

随着思想的不断发展，马克思逐渐对康德、费希特理论与现实

的脱节感到厌倦了。马克思在《献给父亲的诗册》中认为：“康德和费希特在太空飞翔，对未知世界在黑暗中探索；而我只求深入全面地领悟在地面上遇到的日常事物。”^[11] 这种情感导致马克思不得不寻求新的理论出路。我们知道，黑格尔实际上是坚决反对康德在理论和现实之间所划分的鸿沟，认为“理念并不会软弱无力到永远只是应当如此，而不是真实如此的程度”^[12]，理论必然会与现实相联系，应有和现有（“是”与“应当”）之间应该是一种辩证关系而非对立关系。对于现实性极强的政治领域而言，诫命式的“应当”绝对需要成为“是”的问题。因此，在养病期间，马克思开始阅读黑格尔和其弟子的著作，虽然他不喜欢黑格尔“那种离奇古怪的调子”。也正是这些阅读，使得马克思接触到了青年黑格尔派的一些积极分子——施特劳斯和鲍威尔兄弟等，并且不久之后，马克思就加入了“博士俱乐部”，也正是在布·鲍威尔的激励下，马克思开始确定他的哲学博士论文题目并开始了写作。

一般来说，以《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为题的博士论文及其准备笔记和相关文章（包括作为附录的《批评普鲁塔克对伊壁鸠鲁神学的论战》）等文献能够说明马克思这一阶段的思想水平。在博士论文阶段，马克思在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下把自我意识当作决定一切的力量。他在论文中强调伊壁鸠鲁的原子论与德谟克利特原子论之间的区别时，专门讨论了原子的“偏斜运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马克思想要说明原子在“偏斜运动”中体现出来的自由理念，而这种自由理念正是自我意识的体现。因此，列宁认为马克思在这里“所持的还完全是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观点”^[13]。

青年黑格尔派最初主要进行的是宗教批判，但随着他们对现实的不满日益加剧，逐渐转向了政治批判。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时期（1842年—1843年）实现了这一转向。作为一个关注现实的

学者，政治批判一直为马克思所关注，只不过他在之前还没有用一种明确的形式表现出来。马克思在1857年给斐迪南·拉萨尔的信中就曾经针对自己的博士论文的性质进行过说明：“在古代的哲学家中……伊壁鸠鲁（尤其是他）、斯多葛派和怀疑论者，[我]曾专门研究过，但与其说处于哲学的兴趣，不如说处于[政治的]兴趣。”^[14]在《莱茵报》工作时期，马克思把关注点集中到了社会民生问题，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摩塞尔记者的辩护》等。我们注意到，马克思此时主要论文基本上都与社会问题相关，但他的解释框架基本上都限制在政治法律层面上，即试图通过法律的形式去解决现实问题，用代表理性的法律来规制代表着盲目利益的冲突。这就不可避免地会涉及法律与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但马克思并没有对这一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把社会不公等现象完全追究到社会经济层面，而是仍然把解决问题的方式寄托于国家和法之上，并且对物质利益表现出了一种轻蔑的态度，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利益是“盲目的、无止境的、片面的，一句话，它具有不法的本能”^[15]，也就是说，真正的国家和法的本质应该是理性的、公正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认为“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16]。

当然，马克思在这一时期仍从法律本身寻找解决社会不平等等现象的方法，一方面是因为马克思大学所学过的法律对他影响仍然比较大，他对法律有过研究，比较熟悉。而且，因为经济学仍未被马克思纳入研究视野之内，所以他不可能从经济学中寻求解决之道。另一方面，马克思在此时的思想发展水平仍未超越青年黑格尔派，离唯物史观还有较大的距离。^[17]理性在马克思那里仍是解决问题的

最终依据，精神、理性的作用高于一切，因为它们才是“无所不及，无处不在，无所不知。它是从真正的现实中不断涌出而又累增的精神财富汹涌澎湃地流回现实去的思想世界”^[18]。世界万物来源于理性，而理性也必然对世间进行规制。马克思所求助的法律，正是源自人的自由本性的理性的体现。

巴加图利亚把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第二个大阶段（1843年—1845年）看作是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阶段。他又进一步将这一阶段细分为三个较小的发展时期，即克罗茨纳赫时期、巴黎时期和布鲁塞尔时期。

在《莱茵报》工作时期，马克思仍把希望寄托于代表着理性和自我意识的法律和国家，这就促使马克思不得不去深入研究黑格尔的法哲学。^[19]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时期的代表作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其中主要探讨了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将国家作为至高无上的伦理实体，“国家应是一种合理性的表现，国家是精神为自己所创造的世界，……国家高高地站在自然生命之上，正好比精神是高高地站在自然界之上一样。因此，人们必须崇敬国家，把它看做地上的神物”^[20]。国家作为一种精神的表现，必然是沾染着自然属性的人的导引者和规定者，因此国家是比个人更高的东西，它不仅仅是保障个人幸福的手段，而且就是目的本身。与国家不同，家庭和市民社会在黑格尔那里仅仅处于比较低级的位置，因为它们都充斥“自然”的杂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利益的支配。黑格尔认为，家庭是依靠“爱”来实现自我与他人的统一，但是爱作为一种感觉，仅仅是“具有自然形式的伦理”，这种形式的伦理在国家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市民社会则是以物质利益为纽带、按照不同的物质利益划分阶级的社会实体。在黑格尔的思想体系中，市民社会包含着三个环节：（1）需要的体系；（2）司法；（3）警察和同业公会。但是需要的体系支配着其中的人

们。作为私人利益和特殊利益的领域，市民社会中都以自身作为目的，把他人当作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但在黑格尔看来，这种本应成为一个“人对人是狼”的领域，却因为受到“需要”的支配而把这些原子化的个人连接了起来，因为每个人需要的满足必须依赖他人才可能实现。与自然形式的“爱”和粗鄙物质利益相联系的家庭和市民社会必定由国家决定着，要为国家服务，因为国家才是纯粹的理性化身。但是，马克思得出了与黑格尔相反的结论。马克思认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和家庭，而是家庭和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21]。在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上，马克思也认为“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真正的构成部分，是意志所具有的现实的精神实在性，它们是国家存在的方式。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变成国家。它们才是原动力”^[22]。在这里，家庭和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已经被完全颠倒了过来。也正是这种颠倒，使得马克思开始关注经济，意识到物质力量的强大，“国家制度在这里就成了私有财产的国家制度”^[23]。

克罗茨纳赫时期的研究让马克思认识到，市民社会决定性因素是与经济关系密切相关的领域，所以当他1843年10月到达巴黎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通过巴黎时期的理论和实践活动，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把生产—异化劳动作为决定性的因素，因为市民社会是物质关系，归根到底是经济关系和生产关系的总和。异化劳动虽然是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那里借用来的术语，但是它已经不再是黑格尔所理解的充满矛盾的辩证法在所谓的“绝对精神”创造过程中所具有的特别环节；更不是费尔巴哈所认为的用于批判宗教的一种方式。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其中包括《神圣家族》中的相关内容）所表述的异化劳动思想可以说是向唯物史观过渡的最后一座桥梁。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在巴黎时期完成的。此后，马克思到了布鲁塞尔，在那里马克思完成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撰写工作。在这两部著作中，马克思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而且这种突破不仅仅是完成了对德国古典哲学的超越，而且还对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了系统的批判考察，在综合考察结果的基础上，唯物史观才最终形成。

我们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两道轨迹：一是从“自我意识”出发，经由《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最终达到物质生产这一概念；二是从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中脱胎出来，逐渐转变为革命民主主义，并最终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毫无疑问，《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这两条路径的最早结合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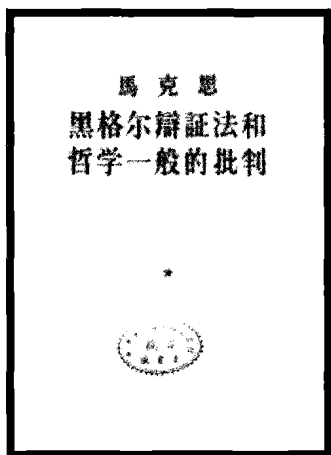
● |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思想来源

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中，列宁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即“德国的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24]。列宁的这种概括是科学的、合理的，他为我们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列宁的这种概括让很多人误以为，马克思对德国的哲学的批判考察和继承主要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成主要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学说，而对空想社会主义的继承也仅仅局限在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等人的思想观念。我们将在这里结合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分析向大家说明，这些内容是得到了马克思的充分吸收的，但他的思想来源还不仅局限于此，要正确把握和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就必须丰富马克思的思想底色，把马克思放在西方思想政治传统中进行考察。

如果结合《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来分析马克思的思想来源，我们的分析将会更加详细、专门一些，既要尊重和撷取列宁这一给定的理论框架的合理之处，也要跳出这一框架的限制。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要像本书序言中所说的那样，将我们考察的基点建立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之上，然后对这些内容有所损益。基于这些考虑，我们仍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视为三个主要来源，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以古希腊思想为主的西方思想传统，将之作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第四个思想来源进行梳理。

（一）德国古典哲学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通过考察列宁的那篇文章不难发现，列宁认为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主要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方面。根据马克思的相关论述，我们认为列宁的这一论断是准确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达过黑格尔对自己的影响，公开承认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受到过黑格尔辩证法的影响，只不过黑格尔的



贺麟先生对“黑格尔辩证法和哲学一般的批判”一节的翻译

“辩证法是倒立着的”，而马克思则把它翻转过来了，目的是为了“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25]。《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也是如此。马克思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一章来专门分析讨论“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因为在马克思看来，青年黑格尔派的很多著作都拘泥于黑格尔的逻辑学，甚至是“逐字逐句重述黑格尔的观点”，但是对于辩证法的实质，青年黑格尔派并没有理解。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辩

证法“表面上看来是形式的问题，而实际上是本质的问题”^[26]。要超越黑格尔及其弟子（主要是青年黑格尔派），就必须看到这一点。

对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实证性研究，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费尔巴哈不但“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而且在此基础上重新“解释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从而论证了要从肯定的东西即从感觉确定的东西出发）”，因而也就“扬弃了无限的东西，设定了现实的、感性的、实在的、有限的、特殊的东西”^[27]。当然，随着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在之后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又扬弃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

通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列宁对马克思思想来源的分类具有很强的概括性和导向性，但是他的那种宏大叙事的考察风格很容易让我们忽略一些细节性、但并非不重要的内容。以青年黑格尔派为例，我们根据马克思的文本发现，马克思的早期研究基本上是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但是如果看不到与马克思思想发展密切相关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必然就会在康德、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成熟的唯物史观之间形成理论鸿沟，唯物史观之前马克思思想发展本应生动而丰满的具体背景阐述就会显得十分的苍白。因此我们必须把青年黑格尔派当作一个重要的、而不仅仅是背景性的思想体系加以介绍。这是因为，从包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内的马克思早期著作来看，青年黑格尔派是马克思思想发展不可忽视的理论盟友和对手。从现实来看，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分子之间也曾一度保持着密切联系，甚至成为青年黑格尔派的积极分子和核心成员。在德国古典哲学中，青年黑格尔派的地位和影响也许并不显著，但是它对青年马克思的影响却是直接的、重要的，甚至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与康德和黑格尔之间的哲学联系是通过青年黑格尔派来实现的，如果没有青年黑格尔派，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能够在多大程度

上影响马克思是值得怀疑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英国著名的马克思研究专家戴维·麦克莱伦认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要人物的思想本身就是重要的”，而且对青年黑格尔派的研究，必然会“弥补人们愈益深切地感到的思想史上的一段空白”^[28]。要考察马克思早期思想，分析《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论证逻辑，就必须进行比较微观的考察，因为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空白才会不断得到弥补。

具体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我们也能看到青年黑格尔派思想与马克思之间的关系，只不过这种关系是一种负面的、否定性的关系，也就是说，是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马克思认为，青年黑格尔派在对当时社会进行批判的时候，既没有认识到黑格尔的辩证法实质，因而也就没有摆脱黑格尔逻辑学的束缚^[29]，与黑格尔辩证法划清界限，也没有对自身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真正形成自己的观点，更没有与群众现实的运动结合起来，他们所做的仅仅是“纯粹的、坚决的、绝对的、洞察一切的批判”而已^[30]。马克思正是基于对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的不满，才决定与青年黑格尔派决裂，并开始和恩格斯一起创作《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自己弄清楚问题的同时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

作为重要的思想资源，青年黑格尔派对马克思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哲学思想和方法，它更是多维度的。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 II, Marx-Engels-Gesamtausgabe）的研究不断深入，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之间的复杂关系也将会更全面地呈现出来。

（二）古典政治经济学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基本上经历了从思辨哲学到实证哲学、从政治批判向经济批判的转变。从1843年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开

始，马克思就将政治经济学当成了论证自己哲学体系最有力的工具，最重要的是，政治经济学所主导的市民社会成了马克思寻找历史发展规律这一历史之谜的最终突破口。

马克思最终走向政治经济学批判也是通过黑格尔实现的。在《莱茵报》工作时期，马克思就已经广泛注意到了利益在市民社会当中的作用，认识到利益比法的原则更有力量，但是，马克思这时候还没有全面认识到物质利益的根本性作用，这甚至还没有达到黑格尔的高度。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也考查了古典经济学，把市民社会视为需要的体系。市民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是逐利者，都希望通过别人这个中介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如果他不同别人发生关系，他就不能达到他的全部目的”，所以市民社会利用这种利己的目的在人与人之间构建起来了一种相互依赖的制度。^[31]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这篇论文中，马克思认为“利益是没有记忆的，因为它只考虑自己。它所念念不忘的只是一件东西，即它最关心的东西——自己”^[32]，在利益支配下的市民社会成员，不会考虑普遍性，只考虑自身的特殊性。这样一来，马克思在解决利益争端的时候只能求助于所谓的代表着普遍理性的法。

随着研究的深入，马克思开始越过黑格尔直接研究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比如斯密、李嘉图等人）的著作。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当中，马克思开始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深入研究，分析社会不平等背后的经济根源。政治经济学中的基本概念——工资、资本、地租、利润等——都已经成了马克思重要的关注对象。当然，如果我们把马克思的《穆勒评注》也囊括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中，那么政治经济学的整个过程——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都成了重要内容。马克思的很多重要概念和思想在这一时期基本上都已经开始出现。而且，古典政治经济学对马克思的影响是非常深远和全面的，以至于马克思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的研究基本上就是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的，并且采用了它的语言和规律，分析社会中的不公现象。马克思的“异化劳动”这一核心范畴正是如此。^[33]

这里需要提到的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作的分析无非是要解决所谓的“李嘉图定律”（Smith-Richardo-Mill Law）问题，也就是，资本主义从根本上说是和谐的还是冲突的问题。尽管马克思的研究被西方所谓主流经济学家所不喜，认为他的研究所充斥的“价值取向”影响了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的科学价值^[34]，但有两点是异常明确的：一是马克思的研究确实给克服资本主义内部矛盾提供了一个方向；二是马克思的经济思想基本上是沿着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出来的，马克思的分析路径是革命性的，但是他的问题域（problematic）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基本上是一致的。

（三）社会主义思潮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马克思主义的另一重要来源是英法空想社会主义，这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也有体现。列宁科学地指出：“当农奴制被推翻，‘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时候，一下子就暴露出这种自由意味着压迫和剥削劳动者的一种新制度。于是反映这种压迫和反对这种压迫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就立刻产生了。但是最初的社会主义是空想社会主义。”^[35]

空想社会主义的积极作用在于，它正确地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暴露出来的问题——贫困、不平等等，但是它并没有指出一条真正能够克服这些弊端的出路，因而只能对资本主义进行道德上的谴责。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安东·欧仁·比雷（Antoine-Eugène Buret）在《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一书中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业“像大征服者那样冷酷无情地浪费那些构成其军队的人的

生命。它的目的是占有财富，而不是人的幸福”^[36]。如果说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一种抽象的假设——因为，“小偷、骗子、乞丐，失业的、快饿死的、贫穷的和犯罪的劳动人，都是些在国民经济学家看来并不存在……的人物；他们是一些在国民经济学领域之外的幽灵”^[37]。——缺少价值维度，那么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则弥补了他们的这一缺陷。马克思对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象进行了大量摘录。

但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还不仅仅来自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甚至包括英国的欧文在内。在近几年的文献考察中，青年黑格尔派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也同样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更早的时期内，马克思的故乡——特里尔有一些重要人物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他的岳父——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他对圣西门是非常钦佩的。另外一位叫路德维希·伽尔的人也是一个傅立叶主义者。这些人对马克思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38]实际上，青年黑格尔派广泛受到了共产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但这是英法社会主义对德国学术界促进的结果^[39]，并且这种影响在青年黑格尔派这个学术圈子内迅速扩大了。布鲁诺·鲍威尔曾经写道：“1843年初，共产主义已经成为一种广为流传的口号，以致《文学报》把卢格在《德国年鉴》最后一期上发表的纲领说成是共产主义的微弱反映。”^[40]

至于德国社会主义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影响，马克思在“序言”中就已经说明了，“不消说，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以外，我也利用了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马克思随后列举了几个重要任务以及他们的相关著作，即魏特林的《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1838年）和《和谐与自由的保证》（1842年）、赫斯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行动的哲学》和《唯一者和完全的自由》以及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等。^[41]我们会在第四章

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讨论。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对这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并没有完全接受，而是进行了批判分析。如果说这一点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还不十分明显，那么在《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开始全面批判这些观点。当然，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更宽一些，那么我们会发现，《共产党宣言》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这一章是对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思潮的系统批判和总结。

（四）西方思想传统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如果说把握住了上面所论述的三大来源，我们就基本上掌握了马克思的思想来源和基本发展脉络，那么，要系统、完整地理解马克思，我们必须将视野进一步扩大，必须把马克思放在整个西方思想传统中来理解。最简单的例证就是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如果不懂西方文明源头之一——古希腊及其哲学，那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论文的意义。对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同样如此。

比如，我们可能遇到这样一些问题，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为什么会自然（界）进行详细的分析？《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共产主义的讨论，经常涉及的两个术语是“共同体”以及与之相关的“共同性”，这一思想我们可以从黑格尔的著作中找到，但是对共同体的理解难道仅仅止步于黑格尔就够了吗？当然，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追问，马克思早期关注的古希腊哲学，是不是在马克思博士论文之后就“销声匿迹”了？如果要理解这些问题，我们所作的就不仅仅是回到那个时代的思想语境，而且还要回到西方思想传统。

我们试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关于类存在物（specie-being）的论述来分析他与西方思想传统，尤其是亚里士

多德传统相承继的。在这一部分，马克思集中讨论了在什么意义上人比动物更具有普遍性，或者说人与动物之间的区别是什么，这种区别的那些内容让人从自然界中脱颖而出。在分析之后，马克思得出的结论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42] 马克思进行这个区分的意义在于，只有界定出了人与动物之间的区别，才有可能揭示出人与自己类本质产生了什么样的异化。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将会在后文中详细讨论（第三章）。这里我们想要提问的是，马克思做出这一区分的依据是什么？我们当然知道，意识是黑格尔的重要概念，但是用意识来界分人与动物，这种处理问题的方法不得让我们想到亚里士多德。根据《论灵魂》，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把灵魂（即生命的动因）划分为三个部分，每个部分承担不同功能。它们分别是营养的灵魂、感觉的灵魂或位移的灵魂和理性的灵魂。动物和植物的区别就在于后者仅仅具有营养的灵魂和机能，而动物则具有感觉和位移的灵魂和机能。但是只有人才有理性灵魂。^[43] 在马克思的“意识”（consciousness）和亚里士多德的“灵魂”（psyche）之间，必然存在着思想传统上的关联。因此，恩斯特·布洛赫认为马克思的思想达到了左翼亚里士多德思想传统的顶峰，只不过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之间的联系是通过黑格尔达成的。迪配更是直接把亚里士多德的灵魂理论与马克思的人的理论进行了对比研究，这也表明了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之间在思想上的亲缘性。^[44]

当然，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之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上文提到的“共同体”问题也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因为在此书中，亚里士多德直接把雅典主要的政治形式——城邦（polis）看作是政治共同体，人也因此被定义成了政治的动物。这种影响的结果是，马克思把人看成了一种“社会的”动物，或者说是一种社会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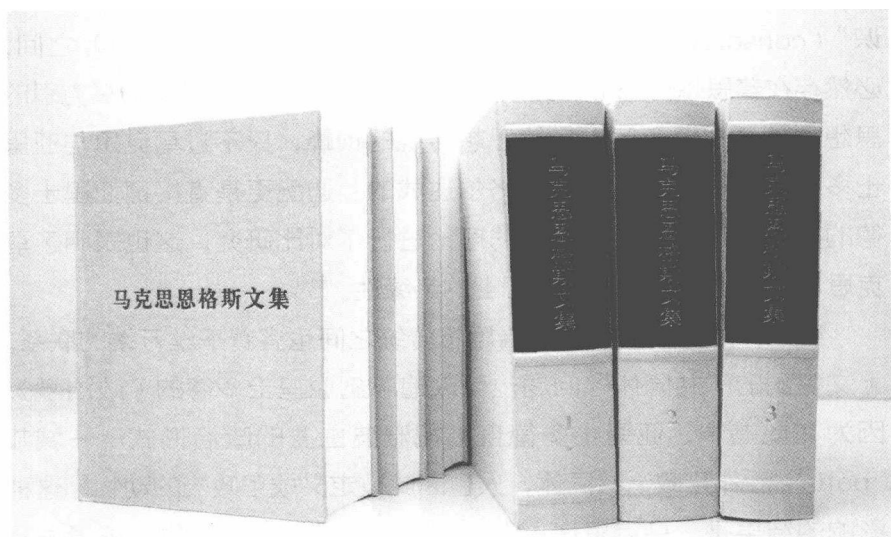
我们在这里之所以提出马克思与西方思想传统之间的关系，目的在于引起人们注意，马克思的很多思想必须在整个西方传统中才能够得到理解。如若不然，我们对马克思的理解势必会出现一些偏差。

【本章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页。

[2]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编纂者认为，“在对各种社会（其中包括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生产关系作出科学的分析以前，要对法、道德、政治和上层建筑的其他范畴的问题进行独立的科学的考察是不可能的”。这一结论有一定的道理，但还是有倒果为因的嫌疑，因为马克思在成熟时期很多写作计划（其中包括“国家”等理论的计划）也没有完全付诸实施。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79页—第780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下），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758页。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4] 在这里需要申明，在马克思那里，国民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基本上是在统一意义上使用，因此，本文在使用的时候也不再进行区分，而且根据这一概念的产生以及它与古代经济学（即家政学）的关系来看，也没有必要进行区分。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页及页下注。

[6] 沈真编：《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哲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89页—第300页。

[7] 他在《青年选择职业的考虑》一文中写道：“我们在社会上的关系，还在我们能够对它们发生决定性的影响之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规定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页。

[8] 麦克莱伦：《马克思思想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9]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97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页、第15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51页—第652页。

[12] 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5页。

[13] 《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3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27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79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1页。

[17] 马克思在这一阶段所达到的思想高度，下面这些作品也可以证明：《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1842年3月—5月）、《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1842年4月）、《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1842年6月底）、《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1842年10月发表于《莱茵报》）、《论离婚法草案》（1842年12月）。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5页。

[19] 关于黑格尔的“法哲学”，在翻译上存在着不小的出入。实际上，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一书的原文全称是 *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oder Naturrecht und Staatswissenschaft im Grundrisse*，直译为《权利哲学的要素：自然法与国家科学的基础》。因此，黑格尔的这本书中不仅仅包括法律，还包括市民社会、国家、伦理、道德等丰富内容。

[20]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 1961 年版，第 285 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250 页—第 251 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251 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380 页。

[24] 《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10 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2 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12、第 198 页和第 197 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00 页。

[28] 麦克莱伦：《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1 页。

[29]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认为黑格尔的“整个法哲学只不过是逻辑学的补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264 页。黑格尔自己也认为自己哲学体系中的“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似乎就是应用的逻辑学”。参见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第 83 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99 页。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最起码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还是把费尔巴哈视为一个例外给予肯定评价的。当然，随着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最终形成，马克思最后对费尔巴哈也进行了批判。也就是说，只有到了布鲁塞尔晚期，马克思才彻底实现与青年黑格尔派决裂的。

[31]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 1961 年版，第 197 页—第 198 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63 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尤其是155页，以及马克思的“穆勒评注”部分。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4] 亨特：《经济思想史——一种批判的视角》，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序”第2页。

[35]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3页。

[36]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8页。

[37]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1页。

[38] 麦克莱伦：《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6页。

[39] 卢格曾经提到，英法社会主义提出的社会和国家批判的实践观点和原则早在1842年就已经引起了德国学术界的注意，其时，马克思正与青年黑格尔派过从甚密，因此我们可以推断马克思受到了这些思想的影响。卢格：《巴黎两年》第1卷，第152页。转引自麦克莱伦：《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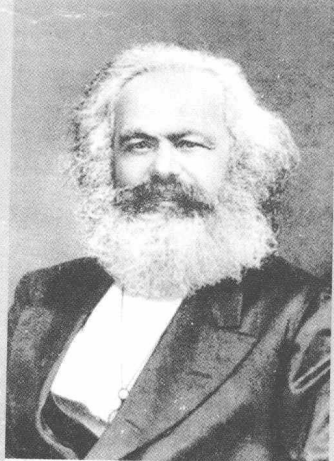
[40] 鲍威尔：《德国党派斗争史》，沙洛顿堡1847年，第3卷，第23页。转引自麦克莱伦：《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7页。

[4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页，第780页的注65。

[4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2页。

[43] 亚里士多德：《灵魂论及其他》，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413a23—25、b11—13、21—24。

[44] Bloch, E., *Avicenna und die Aristotelische Linke (Leipzig, 1952)*; reprinted in Bloch, *Das Materialismus Problem (Frankfurt, 1970)*, pp. 479-546. And David J. Depew, "Aristotle's De Anima and Marx's Theory of Man", in *Marx*, ed. By Scott Meikle, Aldershot, Hants, England; Burlington, VT: Ashgate/Dartmouth, 2002.



第二章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文本结构及内容梗概

马克思在 1859 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到：“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 1844 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 18 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1]

这段话表明了马克思自身的认识过程，即从法哲学过渡到经济学，从抽象思辨过渡到了实证研究。虽然一般认为，《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标志着马克思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了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但是在研究方式上，马克思仍没有完全摆脱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客观来讲，恩格斯使用实证研究的方法要比马克思早一些。当恩格斯用这种方法研究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时，马克思仍然在使用思辨哲学的批判方式，当然，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说的一样，他们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也正是在恩格斯、赫斯等人的影响下，马克思开始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的。^[2]《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转向之后完成的第一个文本。

一 |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文献学研究

在马克思的早期文本中，《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影响最大的文本。我们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判定，主要是基于三点考虑：一是《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马克思生前没有发表，当它重新

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时候，不完整的内容和略显凌乱的文本结构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对它的考证和文本编排大大丰富了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内容；二是《1844年经济学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手迹

哲学手稿》丰富的内容及其内在张力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不管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都试图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寻找新的理论资源，甚至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直接发源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3]；三是文本结构与文章内容之间的联系。这一点似乎包含在上面两点之中，但我们之所以单独列出，是因为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结构编排问题直接影响到了人们对内容的理解。正是基于这三点，我们必须将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文献学考察作为研究的起点。

我们知道，巴黎时期^[4]和布鲁塞尔时期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的关键期，马克思的三大手稿——《巴黎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有两个是在这段时间内完成的。要研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文本结构，我们首先应该了解其背景性知识，分析《巴黎手稿》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间的关系。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巴黎手稿》。对马克思生平传记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虽然他绝不是一个书斋式的学者，但确实是一位善于学习和研究的思想家。在巴黎时期，马克思不但与法国的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德国的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以及很多工人秘密组

织建立了联系，并参加他们的集会，而且还对政治经济学进行了研究，并作了大量笔记，写出了一些文章。马克思在巴黎时期撰写的大量手稿就被称之为《巴黎手稿》。

但是《巴黎手稿》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根据文献学考证结果，《巴黎手稿》主要包括两大部分内容，一部分主要是马克思对一些政治、法律和经济学著作所作的摘录和笔记，我们可以称之为《政治—经济学笔记》^[6]，另一部分就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笔记》主要摘录的经济学著作范围非常广，现列举如下：皮埃尔·布阿吉尔贝尔（Pierre Boisguillebert）的《法国详情，它的财富的减少的原因和补救办法之无效。论财富、金钱和租税的性质。论自然、文化、商业和谷物之利益》^[6]；欧仁·比雷（Eugène Buret）的《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德斯杜特·德·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的《意识形态原理》（主要是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论意志及其作用”）；詹姆斯·罗德戴尔（James Landerdale）的《自然财富和国民财富研究》；约翰·罗（Jean Law）的《货币和贸易论》；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约翰·麦克库洛赫（John MacCulloch）的《论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成就、个别问题和意义》；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奥西安德（Oslander）的《公众对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失望，或释李斯特博士的生产力哲学，附一篇来自乌托邦的祷文》；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其赋税原理》；让·萨伊（Jean Say）的《政治经济学概论》和《政治经济学教程》；卡尔·许茨（Carl Schüz）^[7]的《国民经济学原理》；弗雷德里克·斯卡尔培克（Frederic Sharbek）的《社会财富的理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等。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上面列举的这些与马克思几乎同时代学者的著作不是马克思阅读的全部内容，他还阅读了大量关于古希腊经济、政治、法律方面的文献，比如《色诺芬著作集》(Xenophon's von Athen Werke)、《论家政与希耶隆或君主的生活》、《拉西提蒙人的宪法》、《雅典人的宪法及其他》以及《关于雅典人的岁入及其他》等。

上面所有这些阅读笔记分布在9册笔记本上。即使如此，我们上面列举的著作仍不能断定就是马克思阅读文献的全部，因为苏联学者卢森贝指出，上述名单“不能被认为是齐全的。也许有些札记没有保存下来。此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院声明说，它所发表的札记并不是全部”^[8]。这些笔记和摘录基本上反映了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过程。此外，虽然马克思这时候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掌握材料，但根据与达姆斯塔德的出版商列斯凯签订的合同来看，他的目的不限于此，而是打算出版一部两卷本的《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

另外一部著作手稿，编辑者出版的时候将之命名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样，我们就十分清楚《巴黎手稿》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间的关系了，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仅仅是《巴黎手稿》的一部分。

《巴黎手稿》的写作顺序按照时间大致如下：1843年10月至1844年8月，马克思完成了9个笔记本中的前5个；1844年4月至8月，完成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写作；1844年12月至1845年初，马克思完成了后面的4个笔记本摘录工作（详见下表）。一般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因为与前5个笔记本的写作时间重合，所以它的内容主要受到了前5个笔记本的影响。^[9]

马克思《巴黎手稿》两大部分对照表	
《政治 - 经济学笔记》	《经济学哲学手稿》（按照写作顺序） （1844年4月至8月）
第一册：萨伊、斯卡尔培克 第二册：斯密 第三册：勒瓦瑟尔、斯密 第四册：色诺芬、李嘉图、穆勒 第五册：麦克库洛赫、普雷沃、特拉西、 恩格斯、穆勒 （1843年10月至1844年8月） 第六册：罗德戴尔 第七册：舒尔茨、李斯特、奥西安德 第八册：波斯格威波特、罗 第九册：比雷 （1844年12月到1845年初）	第一手稿 工资、资本的利润、地租 [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 第二手稿 [私有财产的关系] 第三手稿 [对第二手稿第X X X VI页的补充] [对第二手稿第X X X IX页的补充] [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 [分工] 序言 [货币]
编号依据的是 MEGA 1	标题所依据的仍是 MEGA 1

让我们再来看一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巴黎手稿》的发表情况。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一部分最早以俄译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中，发表时的题目是《〈神圣家族〉的准备材料》。1929年，《马克思主义评论》上又发表了题为《关于共产主义和私有制札记》和《关于需要、生产和分工的札记》两部分这样两个片段。在苏黎世的《红色评论。社会主义月刊》杂志上，迈尔（J. P. Mayer）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进行了大致介绍。之后，他和郎兹胡特一起出版了两卷本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早期著作）》，其中第一卷发表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一部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原文则发表在德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部分第三卷上。

值得注意的是，《巴黎手稿》中的几个笔记本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穆勒评注》。我们刚刚提到，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写作与前5个笔记本的写作时间部分重合，那么，《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仅仅是利用了前5个笔记本中的思想，还是说前5个笔记本或其中某一个相对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具有独特价值呢？如果是前者，那么这5个笔记本仅仅具有资料价值；如果是后一种关系，那么我们就需要考证这5个笔记本或其中某一个笔记本内容的价值究竟是什么。在学术界，一般认为这5个笔记本相对独立，有自己的价值，尤其是《穆勒评注》^[10]。国内外学者没有就此止步，他们进而开始追问，《穆勒评注》的写作时间应该是什么时候？如果把它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进行比较，应该处于什么位置？它对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有着什么作用？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有个大致了解（见上表）。大体而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主要包括3个笔记本以及一些补充和增补。对于这些材料，MEGA1是编辑者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安排的，那些笔记本被称之为“第一手稿”、“第二手稿”和“第三手稿”。在MEGA2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采取了两种编排方式：一种是按照写作时间进行编排，这被称之为“第一种呈现方式”（Erste Wiedergabe）；另一种则是根据内容的内在逻辑和结构进行编排，这被称之为“第二种呈现方式”（Zweite Wiedergabe），并根据文本的内容加了一些小标题。^[11]在MEGA2中，3个笔记本分别被称之为“笔记本I”、“笔记本II”和“笔记本III”。中文版一般是根据第二种方式呈现出来的。

根据《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编排，很多学者发现其中存在着一些所谓的逻辑问题，也就是说，在“笔记本I”、“笔记本II”和“笔记本III”之间存在着一个思想上的飞跃。而这个飞跃如果仅仅依据《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本身是难以理解的，所以必须引入马克思这一时期的其他笔记或摘录。根据时间和内容来看，《穆勒

评注》很可能就是能够解释“飞跃”的文本。这样一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大致顺序就是：“笔记本 I”→《穆勒评注》→“笔记本 II”和“笔记本 III”。^[12]但是根据中文版的出版情况，中文1版是把《穆勒评注》放在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前，中文2版则把它放在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后。在最新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根本就没有考虑《穆勒评注》。

本书基本观点是，《巴黎手稿》中的几个笔记本对于研究马克思这一时期的思想而言是非常有价值的，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本身存在着所谓的“飞跃”需要进一步考证。在没有进一步证据之前，我们还是认可目前国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三卷（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的编排。实际上，就是代表着最新研究成果的MEGA2，也是认可这种编排方式的。

● |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基本内容

如何处理文本考证与义理阐发以及现实关照之间的关系，确实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热点。实际上，在我国古代思想史上，这种方法论之争不绝如缕——不管是“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还是所谓的“汉宋之争”，实际上都是要解决如何处理文本与思想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方法论上的争论也可以用来比照当今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一般来说，文献学研究是正确理解马克思思想及其发展的基础，但我们需要辩证地看待文本学研究。我们知道，目前国际马克思主义学术界的一件大事是MEGA2的编纂工作。作为一项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宏大工程，众多学者的参与考证和编撰必然会促进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但它在编辑过程中力图满足所谓的“科学化而非意识形态要求”，却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让人们产生“过多的

想象和期望”^[13]，进而让人们误以为任何马克思思想研究必须依赖这种“科学”的考证，否则，任何研究只能是以讹传讹。

毫无疑问，阅读马克思的原著是我们研究的起点，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来说亦应如此。虽然我们不可能完全“回到马克思”，但是，从文本出发，根据内容来分析文本背后蕴含的哲学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分析马克思到底向我们传达了什么内容，这也算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基本功。但正如伽达默尔所言，任何对文本的解读，只不过是解读者与作者之间实现“视域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换言之，任何人在研究文本的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带入自己的“前见”（Vorurteil / prejudice），并在此基础上理解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即使是所谓的价值中立（value-free）的“马克思学”，也并非没有自己的“前见”影响他们的结论。结果是，在所谓的“客观”外衣下，已经开始作出了“创新性”解释。^[14]

中文 1 版和中文 2 版《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编排比较	
中文 1 版	中文 2 版
序言 [第一手稿] 工资 资本的利润 一 资本 二 资本的利润 三 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和资本家的攻击 四 资本的积累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 地租 [异化劳动] [第二手稿] [私有财产的关系] [第三手稿] [国民经济中反映的私有财产的本质] [共产主义] [需要、生产和分工] [货币] [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	序言 笔记本 I 工资 资本的利润 地租 [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 笔记本 II [私有财产的关系] 笔记本 III [对笔记本 II 第 X X X VI 页的补充] [私有财产和劳动] [对笔记本 II 第 X X X IX 页的补充] [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 [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 [私有财产和需要] [增补] [片段] [分工] [货币]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本书研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基本立场是，要介绍国内外学者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现状，批判吸收他们的观点。我们在介绍《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基本内容时，所依据的就是国内权威学术机构编纂的马克思最新文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15]

我们已经介绍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诸多篇章之间的写作顺序，而且编撰者已经根据每一章节的主要内容加了小标题。在这一部分，我们将根据文本依次梳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基本内容，在此基础上，对一些标题中没有呈现，但是根据《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从整体上能够分析出来的内容进行概括总结。还需要说明的是，像“异化劳动”和“共产主义”这两个核心内容，本书将在下面两章专门进行深入分析。我们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主要包括经济学内容和哲学内容。

（一）经济学内容

1. 工资及其实质

实证研究作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最显著的特点，马克思的出发点必然是最表面的现象。这种现象在资本主义社会就表现为工资。在马克思看来，工人工资的多寡“取决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敌对的斗争”，而且在这种斗争中，工人必然会处于下风，他们的工资水平只能是“最低的和唯一必要的工资额”，这个额度只能让工人维持一种“‘普通人’即牲畜般的存在状态”^[16]，这点工资只能让工人维持自身生活，并能让他们养家糊口——让工人能够维持自身的生活，目的是为了工人能够为资本家提供劳动力，资本家之所以能够让工人去养家糊口，其目的也是为了让工人这个种族不至于绝灭，以便让资本家能够不断获取劳动力资源。用马克

思后来的话说就是，前者强调的是物的再生产，后者强调的是人的再生产。

对于这种悲惨处境，马克思认为工人是逃脱不掉的。这首先是因為，资本、地租和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分离，而且这种只对工人来说是致命的，但资本家则并非一定如此。资本、地租和劳动的分离，意味着工人失去了一切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在这种状态下，工人必须依靠资本家才能够生活，因为只有资本家才能够给他们提供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他们才能够生存下去。但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自身能够通过地租和资本利息来获得生活资料。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认为“资本、地产和劳动的分离，只有对工人说来才是必然的、本质的和有害的分离”^[17]。

马克思根据经济学中的供给关系分析了工人悲惨状态的必然性。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和其他商品一样，它的价格取决于供求关系。在经济学中，供给大于需求会产生两种结果：一是价格降低，二是部分商品卖不出去。在第一种情况下，工人的工资会降低，因为他们是在买主（资本家）的眷顾下才获得工作机会的，这时候工人必然会去屈从于资本家的无理要求；在第二种情况下，会有一部分工人丧失工作机会。

从社会整体角度来看，工人无论在那种情况下都不可能摆脱悲惨命运。因为：（1）当社会财富处于衰退时，整个社会财富缩水，资本家为了避免自己的损失，会把它转嫁到工人头上；（2）当社会财富增长的时候，资本家会扩大生产，这时候他们对工人的需求会增大。劳动（工人）的供给小于需求。^[18]资本家之间会产生竞争。但这种看似能够提升工人生活质量的社会状态，工人还是会因为各种原因继续承受苦难，比如工资提高引起的过度劳动会牺牲他们的健康，甚至缩短他们的寿命。这时候的工人进一步导致工人成了机器的一部分，人的发展是片面的，人与人之间的独立性日渐丧失，

进而之间丧失了自己成其为人的人性；（3）当一个国家的社会财富达致顶点时，工人的境况依然不会得到任何改善。

总之，作为资本家和工人相互角力的表现形式，工资的额度在资本主义社会会一直处于可怜的状态，因为由于没有生产资料，工人对资本家的依赖远远大于资本家对工人的依赖。而且，工人的这种悲惨状态不会得到任何改观，因为“在社会的衰落状态中，工人的贫困日益加剧；在增长的状态中，贫困具有错综复杂的形式；在达到完满的状态中，贫困持续不变”^[19]。

马克思在分析了工人工资与社会贫困之间的必然联系之后，接着不无讽刺地指出了这种现象在国民经济学中的悖论：既然经济学家都认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并能够购买一切东西，但恰恰是劳动的所有者——工人不但购买力极小，而且还必须“出卖自己和自己的人性”^[20]。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谬误就在于，在他们眼中，劳动仅仅是一种“谋生活动”，劳动的所有者——工人只不过是一种“劳动的动物”，是被作为“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来看待的，人的具体的社会属性并没有在这些经济学家的视野之内。^[21]

作为地租和资本的代言人，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不但利用自己手中的生产资料来谋取利润，更为可恨的是，为了追求利润他们不惜联合起来，共同压榨工人，拼命降低工人工资的额度，以致于本来应该成为利润主要构成的工资，反而占了很小一部分。地租和资本利润本应该是“工资受到的扣除”，但现实却是“工资是土地和资本让工人得到的一种扣除”；劳动产品本应该是工人应该获得的东西，但现实是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像“享有特权的、闲散的神仙”肆无忌惮地榨取着来自于劳动的价值。^[22]

2. 资本、利润与竞争

谈到工资，就必然会谈到它的对立面——资本。关于资本，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主要介绍了三个问题：一是资

本的本质。马克思认为，它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购买的权力”^[23]；二是资本家的支配权力的来源。马克思认为，这种支配权力来源于资本家的“所有者”身份，因为他是所有者，所以他对他所拥有（haben）的东西（包括资本）享有支配权，能够用它来购买任何东西，包括劳动，并按照自己的意图使用它们。由于资本能够购买劳动并支配劳动的所有者——工人，那么就可以认为“资本是积蓄的劳动”^[24]；三是资本与其他东西的区别。也就是说，在什么情况下，基金和资金能够成为资本。马克思认为，只有能够带来利润的资金才是真正的资本。

这就涉及了另外一个问题——资本的利润，与之相关的是利润率的问题。既然逐利是资本的内在要求，那么资本家必然会不惜一切来取得利润的最大化，即提高利润率。关于提高利润率的方式，马克思认为有两种：“第一，通过分工；第二，一般地通过对自然产品加工时人的劳动的增加”^[25]。在国民经济学家看来，“资本的利润同资本的量成正比”，而资本又是积累的劳动，因此资本的利润的多寡取决于劳动的投入量的多少。投入资本多，获取的利润就大，因此资本家会不断积累资本，提高利润率。而获得的利润，资本家也不会完全用于消费，而是把绝大部分转化为资本去购买劳动，投入到生产活动之中。

提高利润率，最关键在于提高资本的投入量，所以资本家会拼命积累资本。那么什么是资本的积累呢？马克思认为，“在私有制的统治下，积累就是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的积聚”^[26]，资本的本性必然会导致资本的流动，这种流动的结果是，有的资本家积累的资本越来越多，有的则越来越少，当他们都想让自己手中的资本增多的时候，他们之间就会形成竞争。

资本的流动导致积累的发生，这是一个险恶的竞争过程。我们可以称之为资本积累过程。在马克思那里，资本积累过程就是大资

本家会通过多种方式击溃并吞并小资本家的过程，最终实现资本的快速增长，并实现竞争的逐步减小乃至消失，最终形成垄断。在垄断的情况下，资本家就拥有了产品的定价权，这时候的产品价格是最高的，资本家获得的利润也是最多的。

此外，市场竞争是一种优胜劣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会出现限制资本家随意提高价格的行为——为了保持产品竞争力必然会在他们可接受的范围内降低价格，以便保持产品的竞争力——也会导致无政府主义，因为“经济规律盲目地支配着世界”^[27]。但是，资本家的眼里只有产品，人（包括资本家和工人）在竞争中成为背景性的悲剧存在。

3. 地租

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三大阶级，资本所有者（资本家）、土地所有者和劳动者，与之相应的是三种收入形式，即利润、地租和工资。前面讨论了利润和工资，最后要解决的就是地租问题了。马克思对地租的实质、影响因素、地租的资本化以及地产分割所带来的竞争等问题进行了说明。

我们先看一看地租的实质。在马克思看来，地租从形式上来看是“土地所有者租给租地农场主使用的那些自然力的产物……是扣除或抵消一切可以看做人的劳动产物的东西之后所留下的自然产物”^[28]。但为什么人们会因为你使用了这些自然物（即土地）而向土地所有者支付地租呢？这就涉及了地租的实质问题。马克思认为，地租的实质在于对土地所有人的所有权的确认。因为人们对土地有所有权，那么使用土地就应该支付报酬给所有权人。

现实问题是，地租的多少由哪些因素决定？马克思最先指出了影响地租的两个因素，即“土地肥力的程度”和“土地的位置”。^[29]这两个因素来自于国民经济学创始人斯密的观点。马克思认为，这些观点有其合理之处，但是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因为，土地的肥

力和位置仅仅是一种自然属性，它们固然影响着地租的多寡，但是如果仅仅强调这些就会忽视社会属性对地租的影响，也就是土地所有权（主要是私人占有）在地租中的决定性作用。与社会属性相比，土地的自然属性仅仅是次要的，它依附于土地的社会属性。从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综合角度来看，地租主要是“通过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斗争确定的”^[30]。但这种斗争形式被资产阶级的国民经济学家忽视了。此外，还有一点需要说明，既然地租是资本主义社会三种收入形式之一，那么就涉及了地租与其他社会利益的关系。也就是说，地租是土地所有者从社会财富这个整体中分割得到的利益，这是否存在着此消彼长的问题，即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与其他社会利益之间是否矛盾？斯密认为，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是一致的。但在马克思看来，虽然土地所有者和社会之间有一定的利害关系，但是并不意味着二者的这种关系就是一致的。实质上，“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同租地农场主从而同社会的相当大一部分人的利益是敌对的”，比如与租地农场主、雇农、工业工人和资本家等之间的利益对立等。在这个意义上讲，土地所有者与其他人之间必然存在着斗争。^[31]

第三个问题是，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任何事物都有一种向资本化方向发展的趋向。在资本主义社会，地租的性质与资本的性质一样，都会产生竞争，并导致大地产对小地产的吞并。这一般被称之为“地租的资本化”。具体的发展逻辑是：首先是大地产与小地产之间产生竞争，并形成“大鱼吃小鱼”的现象，结果是富者愈富，大地产者的地产日益集中。但是随着资本的兴起，资本家也开始介入地产领域并形成对地产的占有，在资本家与大地产的竞争中，要么资本家吞并大地产所有者，要么大地产所有者向资本家转化，最终结果是二者之间的差别消失了，社会的成分也单一化、同质化了——人们在社会中“大体上只剩下两个阶级：

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32]。这一过程实质上潜在地揭示了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发展进程，意味着新兴的资产阶级对没落的旧贵族的全面胜利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封建社会生产方式的全面胜利。

在这里需要解释的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土地所有制对于封建的土地所有制而言是一种进步。在一些人看来，封建的土地因为其领主的身份特征而具有独特的个性，甚至土地可以看成是领主身体的延伸。但在马克思看来，这种个性更类似“一种狭隘的民族性”^[33]。当很多人怀着对旧制度的眷恋而感叹美好时代的结束时，他们没有看到真正普遍的文明时代实际上已经来临，而且这种历史发展趋势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所以马克思说：“浪漫主义者为此流下的感伤眼泪，我们可没有。”^[34] 尽管二者在本质上没有区别：在封建社会是土地对人的统治，在资本主义社会，则是金钱对人的统治，人对土地的主动性变成了金钱对人的主动性，但它们都“表明了死的物质对人的完全统治”^[35]。

4. 工业

在地租一节的结尾部分，马克思讨论了地产的分割问题。我们知道，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是当时莱茵省议会讨论“地产析分”（即地产分割）问题的一个反应。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时期已经打算把这个问题当作“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的第四篇论文的主要内容”^[36]，但最终一直延宕到了1844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基本上是赞同了自由派议员的观点，赞同土地的自由交换。这种分割的必然结果是，封建的地产最终落到资本家手中。

在参考了英国的具体情况之后，马克思认为大地产（地产竞争之后导致的结果）必然会把人们推向工业。又因为现代社会中的财富实际上就是劳动的积累，那么劳动向工业领域的广泛涌入，也必

然会导致工业的产生和壮大。本来应该与工业相对立的地产，结果是成了工业的帮手。

此外，工业的强势发展还会挤压地产的生存空间。为了维护自己的封建性质，地产不得不转向国外，与国外地产进行竞争。一旦纳入到竞争体系，那么地产就成了商品，封建地产也就不可能再被少数人垄断，它的封建性质也就会逐渐消退，工业的性质却日益增强。这就是马克思对社会由封建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内在机理的论述。在具体的发生过程中，社会各行业的工业化过程亦非一蹴而就。虽然工业与封建地产相对立，但是工业本身在最初的一些形式——比如“公会、行会和同业公会”——中都具有很浓的封建性质。这里面的资本和劳动还不是完全自由的——资本不能自由流动，劳动者也没有完全的自由身份，因为行会、同业公会等形式的工业主要盛行的是学徒式，劳动力没有人身自由。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种旧的形式必须进行革新，进一步从具体的规定性中抽离出来，逐渐使劳动和资本获得自由。这也是工业发展的必然结果。

这个转变，既可以看作是从封建私有制向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转变，也可以视为从农业向工业的转变。因为马克思认为“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差别，仍然是历史的差别”，我们可据此推断说，农业向工业的转变也是历史的过程。随着这一历史过程的完成，资本主义的各种要素也就具备了：“奴隶转化为自由工人即雇佣工人，地主本身便实际上转化为工厂主、资本家”¹³⁷¹。

逻辑的合理性与历史事实之间存在着差距。古典经济学之前的重农学派基于“农业是唯一的生产”这样的信念来否定工业，维护封建制度。在工业社会初期，工业也确实仅仅是与地产相对立的一种特殊私有财产的种类而已。但是从农业向工业发展的进程在马克思看来具有不可逆转性，而且工业也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尽管马克思也指出了工业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此外，马克思认为，地

产是私有制的第一种形式，而工业资本则是“私有财产的完成了的客观形式”，只有在这种形式下，私有财产才开始了对人的全面统治，并把社会带入到了世界历史进程之中。^[38]

在考察了从农业向工业发展的历史过程之后，马克思进一步对工业的本质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39]这就意味着，对于工业我们既要看到它的唯物主义性质，也要看到它的人道主义本质。我们说它是唯物主义的，是因为工业产品，即人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以感性的、异己的、有用的对象的形式”存在着^[40]；我们说它是人道主义的，是因为工业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41]，体现了人的主体本质。在以前对工业的考察中，人们往往看到了工业产品的有用性，对于这些产品背后包含着的人的本质力量——“对象性的存在”——没有给予充分的揭示和说明。工业中人的维度的消失使得以前的哲学家只能从抽象的政治、艺术和文学等角度来看待人的存在，这就很容易陷入一种抽象人性论之中。

（二）哲学内容

1. 青年黑格尔派再考察

我们在第一章反复强调的是青年黑格尔派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影响，而且我们还认为，他们是作为马克思的对立面来不断促进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可信的结论总是需要充分的论证，因此我们在这里还需要对青年黑格尔派进行进一步考察，审视马克思将费尔巴哈从青年黑格尔派中单独予以正面强调的原因。

根据《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部分，马克思首先申明了他继续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原因，即无论是在批判对象（内容）上，还是在批判方法上，青

年黑格尔派都没有采取更为革命的态度，这在批判方法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们仍在继续采用黑格尔的辩证法，用一种抽象思辨的方式来对旧世界进行批判。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他们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缺少认识，更不要说革命性地应用了。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研究方法应该能够促使他们引入新的内容，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地批判旧世界。

那么这些新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就需要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相关段落进行细致分析了。在批判鲍威尔的《基督教真相》一书时，马克思引用了他的一句话，即“他们（法国唯物主义者）还未能看到，宇宙的运动只有作为自我意识的运动，才能实际上成为自为的运动，从而达到同自身的统一”^[42]。也就是说，马克思对鲍威尔的不满在于，他没有关注到唯物主义及其实证的研究方法对于当代哲学批判的意义，因而他们只能局限在黑格尔的逻辑学内，因而不能看到唯物主义的伟大作用，只是把唯物主义的宇宙论贬低为一种意识的产物。

因此，青年黑格尔派会坚持从自我意识的角度出发进行单调的批判；他们会用这些概念来概括真正的物质世界与历史运动之间的关系；他们会自视甚高地把自己的批判与群众运动分离开，进而嘲笑群众的无知和愚昧。这些青年黑格尔派仍然耽于老调重弹，无暇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反思推进的时候，新的哲学和批判已经从他们面前悄悄流逝了。这种哲学的发展结果是，要么片面地陷入极端激进主义，要么变得越来越保守，后一种趋势在青年黑格尔派中占据了主流。

青年黑格尔派的这种日趋保守的态度让马克思大为不满，也正是如此，马克思开始和恩格斯合作，在之后的《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青年黑格尔派进行批判，并在清算这些思想的不利影响的同时，自己弄清楚问题。^[43]在这里，马克思走出的第一

步就是研究费尔巴哈，引入唯物主义。

2. 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

对于费尔巴哈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地位和作用，学者们褒贬不一。有的学者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存在着大量的费尔巴哈哲学印痕；还有学者认为，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部分，马克思虽然“从称赞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入手，但在结果上却发现了黑格尔辩证法的伟大意义”，进而认为“在《巴黎手稿》这一马克思的思想转变时期，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个比费尔巴哈哲学更为重要的中介”^[44]。

费尔巴哈的哲学和黑格尔的辩证法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孰轻孰重不是我们考察的重点，但有一点我们应该承认，即黑格尔辩证法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影响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对费尔巴哈的影响似乎并不矛盾。如果用唯一的逻辑——“异化”思想的发展来统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全文必然会妨害人们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全面理解，因为这种“单一”逻辑会掩盖马克思思想的丰富性，看不到马克思这些思想内部存在的联系，可能还会把这些思想割裂开。比如，如果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结束之时强调“异化”的目的是为了论证共产主义，并因而认为“异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和地位。但这种结论只能让我们在以后处理马克思思想发展时陷入困境，因为如果我们不能确定“异化”与唯物史观之间的关系，就很难看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生成性，只能认为这一革命的观点是突然出现的，也就是说，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出现了严重断裂。我们只有看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思想的多维性，才能够结合《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文本理解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渐进性和唯物史观形成的逻辑必然性。

让我们再回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分析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其中的分量。要理解费尔巴哈及其哲学，我们必须放在青年黑格尔派的背景中考察。如上所述，唯物主义的引入应该是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在哲学论证中起到的最重要的作用。我们知道，把黑格尔哲学翻转过来是马克思创建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目的之一，但是如何翻转？必须引入唯物主义。只有引入唯物主义，才能够真正确立新哲学的出发点，充分发挥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性。这就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的意义所在。正是认识到费尔巴哈的这一贡献，所以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认为：“费尔巴哈是唯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只有他在这个领域内作出了真正的发现，总之，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从根本上推翻了旧的辩证法和哲学”^[45]。为了全面考察社会现实，真正找到一个能够解决社会问题的理论，马克思在之后的《神圣家族》中开始深入研究法国唯物主义思想史。我们可以认为，这一时期的研究始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其中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关于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评价，我们在第一章已有所涉及，我们只需要对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加以描述即可，大概内容如下：（1）费尔巴哈认为，哲学与宗教一样应该受到谴责，因为它实质上也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另一种形式和存在方式”；（2）他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因而确立了社会关系在哲学中的基础性地位；（3）确立了感性的存在的地位，这也应该成为辩证法（以及“否定之否定”方法）的出发点。这样一来，“感觉确定的东西”即“现实的、感性的、实在的、有限的、特殊的”人“不应该被限定或否定，而应该被予以肯定，因为这样的历史才是真实的历史，才是“既定的主体的人的现实历史”^[46]。所以，费尔巴哈的这种人道主义对马克思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47]

3. 黑格尔哲学及其批判

马克思在考察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时候，是通过与黑格尔哲学比较的方法来论证费尔巴哈哲学的合理性的。在对两人的哲学进行比较研究之前，马克思还谈到了现代社会的批判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黑格尔哲学及其辩证法等问题。马克思认为，要想合理批判现代社会，分析目前的青年黑格尔派以及费尔巴哈在这种批判中的地位和作用，就必须回到黑格尔。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分析主要是从他的辩证法切入的，但与青年黑格尔派不同的是，马克思的批判结合了他对国民经济学的研究。需要注意的是，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已经对劳动、市民社会等国民经济学概念进行了分析。这些概念的具体讨论，我们将在后面结合“异化”理论进行分析，我们在这里主要考察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分析。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哲学的分析是从他的《现象学》开始的，因为在马克思看来，这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开始”^[48]。马克思首先简要地分析了黑格尔《现象学》的框架结构，即从自我意识开始向绝对知识发展的推演过程。^[49]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逻辑体系（黑格尔的《哲学全书》）虽然囊括了整个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内容，但实质上只不过是“哲学精神的展开的本质，是哲学精神的自我对象化；而哲学精神不过是在它的自我异化内部通过思维理解即通过抽象方式来理解自身的、异化的宇宙精神”^[50]。不难看出，黑格尔的哲学发展，在形式上是辩证法的、革命的、历史的，但在具体内容上却是抽象的，整个哲学体系只不过是一部空洞的绝对精神的自我演化史。

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上述过程有双重错误。一是黑格尔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是错误的。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是从绝对精神出发的，但最后又复归到绝对精神之中。黑格尔用思想的辩证发展过程

来分析“财富、国家权力”等国民经济学内容，把这些物质的内容看作是“思想本质，因而只是纯粹的即抽象的哲学思维的异化”^[51]。当然，马克思并不否认这种分析的价值，认为“逻辑学作为精神的货币”，具有“人和自然界的思辨的、思想的价值”^[52]，但是，这样的分析与现实性是脱节的，这种“抽象的、绝对的思维的生产史，即逻辑的思辨的思维的生产史”^[53]，并不能给现实批判带来多少实质性的益处。

黑格尔的第二个错误是把“感性、宗教、国家权力等等”看作是“精神的本质，因为只有精神才是人的真正的本质”^[54]。在马克思看来，宗教、财富等表现出来的异化现象应该看作是人的处境的现实反映，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异化的语境中才能够看到宗教、财富等异化的本质。但在黑格尔那里，这些异化也只是精神异化的体现，我们可以说黑格尔的第二个错误是第一个错误的延伸，因为第二个错误旨在说明异化的全面扩大，不仅仅涉及经济内容，而且涉及国家、宗教等内容。因此，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哲学结论进行了概括性说明，认为“黑格尔在哲学中扬弃的存在，并不是现实的宗教、-国家、自然界，而是已经成为知识的对象的宗教本身，即教义学；法学、国家学、自然科学也是如此”^[55]。马克思必然会反对黑格尔的这种异化观，因为后者的异化批判仅仅是一种“隐蔽的、自身还不清楚的、神秘化的批判”^[56]，这种批判的结果必然会与青年黑格尔派实现趋同，因为批判本身仍是空洞的，不针对自身的批判。此外，黑格尔的辩证法除了与现实对立之外，还会在自身内部产生矛盾，并且会为宗教等意识形态留下理论资源。

通过马克思的论述不难看出，黑格尔的辩证法之所以是神秘的和隐蔽的，就在于它的革命性被其唯心主义的外壳禁锢住了。黑格尔哲学中“关于‘苦恼的意识’、‘诚实的意识’，关于‘高尚的意识和卑鄙的意识’的斗争等等这些章节，包含着对宗教、国家、市

民生活等整个领域的批判的要素”^[57]，但是这些要素都是通过精神异化的形式实现的，因而，辩证法的运动就成了一种“纯思想的辩证法”。

但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并不是完全消极无用的。以辩证法为主要特征之一的黑格尔哲学体系包含着大量的合理要素，即使是这种“纯思想的辩证法”也具有很多“积极的环节”。以“异化”概念为例，黑格尔的“异化”概念不仅仅是一种绝对的否定。“扬弃”作为异化的规定内容之一，它强调了主体把外化之后的内容收回到自身并占有对象性本质这样的内涵，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动态的历史过程，对于解释历史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正是异化的这种革命性及其历史性内涵，才让马克思有了将异化的辩证法与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进行结合的可能。此外，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是以人作为出发点的，而这也具有了积极意义——当然这种积极意义可能是黑格尔本人都没有意识到的。这种积极意义体现在，“它潜在地包含着批判的一切要素”^[58]。在这里不难发现，当马克思考察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实质内容、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基础之后，黑格尔的辩证法为马克思提供了最后的批判社会的工具。正是利用这些复杂的复合型的工具，马克思才对社会及其异化现象有了更深的认识，他的批判也才更加科学合理，为提出唯物史观、论证共产主义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4. 马克思的自然观——人化自然

日本学者山之内靖曾提到，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方面成果卓著的苏珊·伯克-默斯在《梦幻世界和灾难》中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它包含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这种解读既算得上是一种理论上的成功探索，也算得上是从马克思文本能够找到的能够“‘与当今我们的时代共鸣’的重要事实，‘这一点在政治上也是很重要的’”^[59]。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是如何论述自然，处理人与自然的的关系的？在对自然的论述中，马克思区分了两种自然，一种是唯心主义的自然观，它以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观点为代表。黑格尔认为，自然就是绝对观念的逻辑演化，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外化。自然界是蕴含在思想里面的，自然及其发展就是“作为抽象、作为思想物而隐藏在它里面的自然界从自身释放出去”^[60]。当然青年黑格尔派也是如此。他们在批判法国唯物主义的时候，认为“宇宙的运动只有作为自我意识的运动”，才能算得上是自在自为的运动。^[61]

另外一种自然观则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它们把感性的存在（也就是物质世界）看作是第一位的。比如在如何看待自然科学的时候，费尔巴哈就认为科学必须以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为基础，只有从自然界出发的科学才是真正的科学。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基本上是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反对唯心主义的自然观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列举了地理知识来予以证明：“大地创造说，受到了地球构造说即说明地球的形成、生成是一个过程，一种自我产生的科学的致命打击。自然发生说是对创世说（Schöpfungstheorie）的唯一实际的驳斥。”^[62]

论述两种自然观的对立除了反对唯心主义的自然观之外，更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黑格尔的自然哲学中，如果自然仅仅是自我意识的一种外化，那么自然必然可以为主体的自我意识所宰制。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把人这个自然界的产物也看作是一种自我意识的外化，人也就仅仅具有主体性，缺少客观性和现实性，人的历史也就只能在自我意识的范围内运动发展，人的历史就被归结成了自我意识的逻辑演进史。

与之相反，马克思要确立的是一种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并在此基础上确定自然主义的人本学。马克思在介绍费尔巴哈的自然科学观

时，认为全部的历史应该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作准备的历史（发展的历史）”^[63]。进一步的推论就是，历史与自然是统一的，自然界为人生成为人奠定了物质基础。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自然地位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认为，自然界对于人来说，首先是基础，人必须依靠自然界生活，人必须从自然界中吸取营养，“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64]。毫无疑问，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界是第一位的，精神世界通过人与自然界发生联系。由此可知，人的精神生活同自然界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因为不但自然科学和艺术等的研究对象都是自然界，而且即使是完全抽象的思辨，实际上也必须依赖于生物性的个体——人发挥作用。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精神生活及其产品虽然超越了自然界，但不能脱离这个世界而独立存在。

除了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外，人的社会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自然性的。我们知道，人的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就是两性关系，而这种关系实质上是一种依赖于自然关系的社会关系，人的自然的性别差异是两性关系的基础，是家庭的自然要素之一。人类的其他社会关系也与自然界保持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最为典型的是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劳动关系，如果我们详细考察劳动这一概念的时候，它在私有制条件下具有无可辩驳的社会关系，但是它也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一种交互活动。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眼中的自然界并不是消极被动的自然界，人与自然之间一直发生着相互作用。从人的角度来看，自然必然是人化的自然，因为人必须从自然中来确证自己的本质，而且，

“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实践方面来说，人的本质的对象化都是必要的”^[65]；从自然界的角度来看，真正现实的自然界，也就是有意义的合理的自然界，是“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而且，只有通过工业“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66]。这样一来，自然的生成历史与人类的历史就统一了。

把自然视为人化自然，这种思路为实践唯物主义的提出和论证奠定了理论基础。我们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看到马克思给予实践以基础性地位的时候，《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实际上已经埋下了伏笔。而且，当我们讨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究竟是不是“实践唯物主义”，在这里也可以窥见一些端倪。可以说，没有马克思讨论的人化自然，就不可能发展出这种实践的唯物主义，也就不可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革命。

当然，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讨论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于以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指导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改造也同样具有现实意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兴起，生态文明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都可以说从马克思的自然观中获取了理论养料。

【本章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2] 在1843年—1845年间，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他既对鲍威尔、施蒂纳甚至是费尔巴哈等人进行批判，也与赫斯等少数青年黑格尔派分子合作，而且这种合作一直持续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根据考证，《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的“五‘霍尔斯坦的格奥尔格·库尔曼博士’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预言”这一部分实际上是赫斯写的，因为手稿的撰写人魏德迈在这部分末尾加上了“M. Hess”这样的标志。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赫斯的成果纳入到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文本中，说明

他们对赫斯还是比较认可的，而且这时候的赫斯对马克思的影响也依然存在。比如恩格斯认为赫斯在1845年发表的《最后的哲学家》对费尔巴哈、施蒂纳和鲍威尔“唯心论的妄想”的批判，站在了与马克思“相同想法”的地平线上。参见张一兵：“赫斯：一个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思想先行者和同路人”。载于赫斯：《赫斯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代译序”第3页）。

[3] 比如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立，或者说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的对立，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对立，都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有着直接或间接、或紧或松的联系。

[4] 1843年10月下旬离开德国到1845年初移居布鲁塞尔为止，一直住在巴黎近郊，这一时期被称作“巴黎时期”。

[5] 日本学者杉原四郎和重田晃一曾将这些摘录和评注翻译出版并以《经济学笔记》命名。参见韩立新：“《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及其意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1期，第114页。不过这样的命名不是十分合适，因为我们从后面的文献摘录目录中可以看到，马克思还对意识形态理论以及古希腊的宪法、政治等进行了深入研究。似乎将这些笔记命名为《政治-经济学笔记》更好一些。

[6] 黄楠森先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册）中提到了这本著作，但题目是《德国详情》。根据布阿吉尔贝尔的原文，可能这里有些错误。原文如下：*Le detail de la France, la cause de la diminution de ses biens, et la faillite du remede. Dissertation sur la nature de recesses, de l'argent et de l'argent et de tributs. Traité de la nature, culture, commerce et intérêt des grains.* 此处根据原文进行了修订。参见黄楠森：《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09页；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II），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135页。

[7] 在很多著作中，都把马克思摘录的许茨的著作当成了舒尔茨的著作，即《生产的运动》。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包括日本学者在内的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参见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II），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136页。

[8] 卢森贝：《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学说发展概论》，1954

年俄文版，第61页。转引自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II)，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136页。

[9] 韩立新：“《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及其意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1期，第115页。但是根据MEGA2的编辑情况来看，上面的笔记本的发表顺序应该是：第三册（1843年年末至1844年年初）→第一册和第二册（1844年春）→第四册（1844年夏季和秋季）→第五册（1844年夏）→第九册（1844年夏季到1845年年初）。第六册和第八册笔记本被认为写于布鲁塞尔时期。下面的表格参考了韩立新教授的上述论文。

[10] 之所以专门提及《穆勒评注》，是因为很多学者在这一笔记本中提出了所谓的新思想。当然，这种观点是臆测还是科学，就必须根据《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内容和逻辑，甚至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前后的文本（比如《神圣家族》）进行判断。

[11] 参见韩立新：“《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及其意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1期，第123页。

[12] 对于这个顺序，很多研究马克思文本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并且提出了更详细的分析，加入了《巴黎手稿》的第四、第五个笔记本。比如拉宾认为应该是：麦克库洛赫、普雷沃、恩格斯、李嘉图、穆勒、特拉西→《第二手稿》和《第三手稿》，罗扬则认为：李嘉图、穆勒（第四笔记本）→《第二手稿》→麦克库洛赫、穆勒（第五笔记本）→《第三手稿》。

[13] 邹诗鹏：“关于新MEGA及其研究的几个评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6期，第20页。

[14] 比如，利用所谓的文本研究结果来断言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对立等。这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费尔巴哈”章也是如此。日本学者广松涉就是依据版本考证得出了“恩格斯主导说”这样的结论。

[15] 国内收录《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还有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但它与《马克思恩格斯文集》收录的文本内容一样。在2000年发行的单行本中，《穆勒评注》被作为附录收录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出版于2009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出版于2002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出版于2000年。

[16] 上述引文均出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5页。

[17] 上述引文均出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5页。

[18] 马克思认为，只有在下面这种条件下，国家和社会的资本和收入才会增加，引起劳动的供给小于需求：资本积累导致扩大再生产，进而扩大分工，分工的增加导致工人人数的增多。《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0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2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2页。

[21] 上述引文分别来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4页—第125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3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0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0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2页—第133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4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9页。

[28] 斯密：《国富论》，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2页—第143页。

[29] 斯密：《国富论》，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2页—第143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4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7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0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1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0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2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83页注释79。

[3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3页。

[3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1页—第182页。

[3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2页。

[4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2页。

[4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3页。

[4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8页。

[43] 马克思在这里所批判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在此后的《神圣家族》中进行扩展。比如青年黑格尔派对群众的态度和对所谓的“末日审判”等内容，就分别在“《神圣家族》第7章的第1节《批判的群众》，第9章《批判的末日的审判》”中开始详细驳斥。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44] 韩立新：“从费尔巴哈的异化到黑格尔的异化：马克思的思想转变”，《思想战线》2009年第6期，第71页。

[4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9页、第198页。

[4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0页—第201页。

[47] 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本书是放在第四章和共产主义一起进行的，因为马克思在讨论这两个概念的时候，二者之间的依存关系非常密切。

[4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1页。这里的《现象学》就是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

[49] 这个过程大致如下：自我意识（意识→自我意识→理性）→精神（真的精神；伦理→自我异化的精神；教养→确定自身的精神，道德）→宗教（自然宗教→艺术宗教→启示宗教）→绝对知识。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2页。

[5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2页。

[5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3页。

[5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2页。

[5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3页。

[5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4页。

[5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6页。

[5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4页。

[5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4页。

[5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4页。

[59] See Buck-Morss, Susan. 2000. *Dreamworld and catastrophe: the passing of mass utopia in East and West*,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参见山之内靖：《受难者的目光：早期马克思的复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中文版序言”第3页。

[60] 黑格尔：《全书》第3版，第222页。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9页。

[61] 鲍威尔：《基督教真相》1843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第113页—第115页。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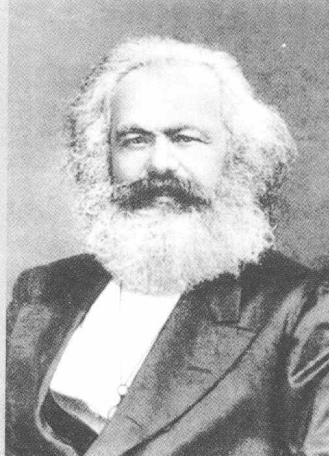
[6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5页。

[6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4页。

[6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页。

[6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2页。

[6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3页。



第三章

「异化」与私有财产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包括丰富的原创性思想，其中不乏一些马克思新哲学的思想萌芽，因而，有些学者将之称为“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源头活水和思想基因”^[1]。《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内容的丰富性也给予了学者们理论开拓的空间。但是，如果我们要问，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哪个概念影响最大？或者说哪个概念最能体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特性，可以成为它的身份标识？我想大多数人会同意是“异化”。而与异化相关的概念，则是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法国著名学者科尔纽在《马克思恩格斯传》中认为：“《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两个基本主题——揭示资产阶级社会中人的自我异化和这种异化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克服……这两个主题是紧密联系着的，因为异化的产生及其扬弃都被描述为和解释为历史发展的结果。”^[2] 尽管人们对这两个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这实际上彰显出了马克思思想的巨大张力和吸引力——但科尔纽所作的判断基本上是客观的。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本书将利用两个章节对异化和共产主义这两个概念（或者说主题）进行详细分析。为了能更透彻地理解马克思思想，我们没有把研究范围限定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内，而是更广泛一些——除了介绍马克思对这些概念的论述之外，还对这些概念发展源流进行介绍。

一 | “异化”概念的源流

在介绍“异化”的严格哲学意义之前，对它进行一些词源学考察是有必要的。“异化”一词在英文中为 alienation，法文为

ali é nation, 二者都源于拉丁文 alienatio。根据卢卡奇的说法, 德文的 Entfremdung (异化) 就是英文 alienation 翻译过来的。在拉丁文中, 这个词是一个多义词, 它至少可以应用于以下三种领域并拥有近似的内涵: 在法学领域内, 它是具有转让、让与, 权利和财产的让渡等涵义; 在社会范围内它有与他人分离、疏远, 与祖国、与神分离、疏远的意思; 在医学、心理学范围内它的意思则是精神错乱、精神病等等。

对于如此复杂的一个术语, 很多学者对它的起源非常感兴趣。^[3]有的学者认为, “异化”一词肇始于基督教《旧约》中关于偶像崇拜的概念^[4]; 有的学者则追溯到了更为久远的思想, 认为它可以从柏拉图的二元论的哲学途径中找到印记。但是, “异化”作为哲学术语, 在 17 世纪、18 世纪的唯物主义和启蒙思想家的那里才开始出现, 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得到了普遍使用, 到了马克思, “异化”才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当然, 这又与费尔巴哈和黑格尔两人的“异化”理论的影响分不开。

在最初使用的时候, “异化”是一个政治哲学术语。英国唯物主义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在《利维坦》(Leviathan) 中讨论人类从“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自然状态过渡到国家存在文明状态时, 借助了社会契约的思想, 也就是让人们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让渡给一个人或一些人 (比如议会)。人们通过订立社会契约而让渡自己权利给国家的行为就称之为“异化”。我们在这里已经看到, 这种原初的“异化”概念就已经有了疏离和排斥的含义, 虽然它的主要含义仍然是“转让”, 但是已经具有了“异己”的性质, 因为国家这个怪兽 (即利维坦) 要求人们的绝对服从, 国家拥有对人民的绝对权力, 而人民只有服从。^[5]

卢梭也有很多“异化”思想, 而且他对“异化”的使用, 在内容上更加宽泛了。比如在政治哲学中, 从人与社会这一维度来看,

卢梭认为社会契约的达成也是异化的结果，也就是说人们要从自然状态过渡到政治状态，就必须“让渡”自己部分私人权利，形成一种公意（general will），组成国家以行使公共权力；在人与自然（状态）这一角度来看，人类从自然状态向文明状态的过渡，实际上也是一种“异化”，因为人们创造的文化只不过是一种限制人们的桎梏，“我们的种种智慧都是奴隶的偏见，我们的一切习惯都在奴役、折磨和遏制我们。文明人在奴隶状态中生，在奴隶状态中活，在奴隶状态中死。”这种奴隶状态最直观的表现就是，人“一生下来就被人捆在襁褓里；他一死就被人钉在棺材里；只要他还保持着人的样子，他就要受到我们的制度的束缚”^[6]。当人们的文明和制度制约人的时候，异化的“异己性”就充分显露出来了。不过，卢梭最为可贵的是，他还在经济学意义上使用这个术语。卢梭在他的《社会契约论，或政治权利的原理》和《论政治经济学》中都在财产“让渡”的意义上使用过这个词。当然，卢梭在使用这一词汇的时候主要强调的是它的否定意义，因为当卢梭看到社会不平等现象时，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社会关切感——出于对财产过分集中于王公贵族手中的不满，他主张公民在财产上的平等。

如果说英法思想家主要是在政治哲学意义上使用异化，那么，把“异化”这一术语的内涵和外延予以丰富和扩展的，是德国古典哲学家。王若水先生认为：“我们现在使用的‘异化’概念是创始于黑格尔，继承于费尔巴哈，完成于马克思。当然，还可以从黑格尔的异化概念中找到费希特和席勒的影响。”^[7]

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费希特曾较早地使用过“fremd”（异己的）这个词，用以表示自我和非我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费希特为了发展康德的知识学，从“绝对自我”出发重新建构了知识的基础。当绝对自我通过本原行动（Thathandlung）设定了最初出发点——自我之后，知识学的建构活动就开始了。这种行动有三个基本步骤，

即“自我设定自己本身”、“自我设定非我”以及“自我与非我的统一”。但是，如何从自我来设定非我？这就必须依靠“fremd”（异己的）这个过程了。也就是说，非我实际上就是自我异化（外化）的结果，而整个知识学就是在这样一个“自我设定非我”的不断“异化”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

如果说费希特的“异化”仍没有占据重要位置的话，那么异化在黑格尔哲学中占据的则是核心地位。“异化”作为一个哲学术语开始具有了一种对立的含义。我们知道，由于黑格尔的哲学是一种辩证法哲学，所以它要求对实体的理解必须“一分为二”，这种方法就是“单一的东西分裂为二的过程或树立对立面的双重化过程”^[6]。在法兰克福思想危机之后，黑格尔的矛盾统一学说越来越成熟，相应地，“异化”在他的哲学体系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

但是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有两个意义非常接近的词，即 Entfremdung（异化）和 Entäußerung（外化），他经常把二者作为同义词加以使用。随着黑格尔思想的发展，“外化”的应用范围不断地得以扩大，并通过三种意义体现出来：它首先是指一种与劳动和各种社会活动相结合的复杂的主客关系，这种关系具有经验的普遍性；其次是特殊的资本主义形式的具有对抗特征的“外化”，但是这种形式黑格尔本人并没有意识到；第三种是指一种得以高度哲学概括的“外化”，它是用来表征主客体辩证运动过程的。从上述的概述不难看出，“外化”的适用范围非常广。黑格尔对这一概念的使用范围的不断扩大也证明了这一点。但这个概念还不仅仅指一种关系，更主要的是它指的是一种对立关系，因此，黑格尔还使用了异化，比如在自然哲学中，黑格尔常常使用 Entäußerung 表示绝对精神的纯逻辑概念产生出自然界，而自然界作为绝对精神的物质依托，又常常与精神作对，是对精神的玷辱。这就是著名的“精神异化论”。

到了费尔巴哈，异化概念使用开始发生变化。虽然他不再用异

化这个概念来推演他的哲学体系（实际上对于唯物主义者来说这也是不可能的立场），而是用它来分析宗教。在他看来，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外化，上帝的智慧是人的智慧的外化，但上帝又反过来统治人、支配人。费尔巴哈认为，所谓的上帝概念，不过是人把自身进行了“异化”，形成了上帝，并进而对上帝产生了依赖感。所以，宗教的本质实际上就是人的本质。但是，上帝是人的本质异化的结果，虽然上帝是从人本身分离出去的，但是他又反过来开始压制人，上帝的万能反衬出了人的无能。上帝的全知全觉对照着人的愚昧无知。但实际上，“属神的本质不是别的，正就是属人的本质，或者，说得更好一些，正就是人的本质，而这个本质，突破了个体的、现实的属肉体的人的局限，被对象化为一个另外的、不同于它的、独立的本质，并作为这样的本质而受到仰望和敬拜”^[9]。不过随着认识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现实的处境是“知道上帝而自己又不是上帝，认识福乐而又不亲自享受福乐，这是一种分裂，是一种不幸”^[10]，宗教的虚伪性和异化性质就显露出来，但在费尔巴哈看来，这种“异化”本质上是“人跟他自己的本质的分裂”，要克服这种宗教异化，就必须把上帝的性质回归给人。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费尔巴哈的异化与黑格尔的异化都是马克思考察的主要对象，但是二者在“异化”概念本身存在着一些区别。日本学者作了这样的归纳：“在黑格尔那里，自我异化和自我复归过程对精神的自我展开（历史）来说是无法避免的一个必然环节。自我异化是历史的一个过程。然而，在费尔巴哈那里，自我异化是意识的一种错觉、错误，也就是说，异化概念从事实概念变成价值概念。在黑格尔那里反映客观历史运动的一个事实过程的异化概念现在转变成了反映主观的反价值的状态。”^[11]但是，二者因为立场的不同，发生这样的差别也就可以理解了，只不过我们认为，二者最重要的差别在于，黑格尔的异化理论在《法哲学原理》

中和市民社会和劳动等政治经济学概念联系起来，也就是说，黑格尔把辩证法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了结合，虽然这种结合仍然停留在“绝对精神/自我意识”的外化运动过程中，但费尔巴哈对经济学的考察是没有的。当然，正是因为黑格尔的这种自我意识的演化特点，使得他的政治理论具有了历史的维度。

● |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

我们已经勾勒了“异化”这个概念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正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异化理论，使得马克思的劳动异化更加成熟，对于马克思形成唯物史观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是，我们应该明确，“异化”这个概念并不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才开始出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后也没有完全消失，尽管使用得相对较少了。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他已经在自我意识的辩证运动中使用“异化”。晚期的“异化”概念，也主要是从经济层面使用的，少了形而上学的思辨，多了实证性的内涵。这就表明，马克思并没有向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抛弃了这种“不成熟的、幼稚的”思想。相反，我们认为这个哲学概念无论对于马克思还是马克思主义（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欧马克思主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这一个概念的内涵虽然发生了一些变化，但绝对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大。^[12]

我们之所以认为马克思的劳动异化并非像人们所认定的那样幼稚，是因为马克思对异化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在博士论文时期，马克思就已经开始使用异化的概念。比如在他的博士论文^[13]中，马克思讨论现象与本质的关系时提到，“只有在伊壁鸠鲁那里，现象才被理解为现象，即被理解为本质的异化，这种异化本身是在它的现实性中作为这种异化表现出来的”^[14]。在这里我们可以说马克思坚

持了一种概念异化论，里面充满了青年黑格尔派的色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论犹太人问题》等论文中，马克思还谈到了人的本质异化问题，认为“让渡是外化的实践”，人只有在异己的本质的支配下才能从事生产活动，而这种异己的东西就是金钱。^[15] 那么与金钱相对立的人的本质是什么？是一种普遍的理性，也就是青年黑格尔派所说的自我意识。当然，马克思这时候对自我意识的论述主要侧重于政治和法律。如果从政治角度来界定人的本质，把人看作是“一切实体性组织的本质”^[16]，那么这种实体性组织的本质必然会是一种具有先验性质的本质，是人这个类所具有的普遍性和共性，即自我意识。^[17]

马克思对自己的这种思想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开始就已经通过对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的批判开始自我清算了。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我们已经知道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异化论进行了区分。马克思的工作并不仅仅如此，他还把黑格尔的“异化”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思想进行了“综合”，并且实现了超越。马克思超越的结果就是吸收了黑格尔关于“异化”与劳动之间的辩证关系，形成了自己的“劳动异化”思想。

但是必须注意的一点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必须对 Entfremdung（异化）、Entäußerung（外化）和 Vergegenständlichung（对象化）等予以区分。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虽然马克思经常把异化和外化一起使用，但是二者还是有区别的。所谓的外化，就是指主体力量的对象化，对象化与外化是没有本质区别的，在一般情况下，主体的本质力量外化后表现出来的物化劳动——劳动产品必然会复归到主体本身当中，在一定意义上，对象化是外化过程的一部分，前者仅仅表示主体本质力量的物化，后者则是指主体的本质力量物化后又复归到主体中来

的过程。但是异化则不同。所谓异化是指“主体由于自身矛盾的发展而产生自己的对立面，产生客体，而这个客体又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而凌驾于主体之上，转过来束缚主体，压制主体，这就是‘异化’”^[18]。这样，异化就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它必须从主体出发来产生客体，客体也是主体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二是这个客体必须与主体相对立并产生一种异己的统治主体的力量，也就是说，异化后的客体并不会复归到主体，相反，它还会成为一种与主体相对立的力量。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异化只有在彻底的私有制条件下才能够形成这种完全对立的局势。由于资本主义社会是彻底的私有制，即资本完全归资本家所有，工人与资本家并没有直接的人身依附关系，但是正是这种彻底的占有和完全的自由才导致了异化以一种非常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在其他社会形态下，这一现象并不突出。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分析的“异化劳动”主要体现在“笔记本I”中论述四个规定。可以认为，马克思对“劳动异化”的分析是从实证（国民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最终又回到了经验的世界。它的出发点突出的是人的现实的苦难——这种苦难是以物对人的统治这类经验的现象开始的，其结果则强调了劳动异化的最终结果对社会产生的重大影响，亦即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对立。这个过程是从物的异化（异化的第一个规定）向人的异化（后面三个规定）逐渐过渡的框架结构和动态过程。^[19]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马克思的论证过程。

规定一：劳动产品（劳动结果）劳动者与相异化。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首先分析的是劳动者与劳动产品之间的异化关系。我们耳熟能详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开篇论述，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

式。”^[20]如果说马克思以商品开始自己对资本主义的论述，原因在于他把商品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要素，并包含着这个社会的一切秘密，那么我们也可以说，马克思以商品作为分析起点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它的经验性。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同样如此。马克思首先从劳动产品入手分析，是因为必须“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才能够说明这个国民经济学的诸多现象，而当前的这种经济事实就是“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劳动不仅生产商品，它还生产作为商品的劳动自身和工人”^[21]。

劳动产品就是作为一种人的类本质的异化的产物，本来应该属于工人，但是由于私有制的缘故，体现了工人主体本质力量的劳动产品被资本家所占有，工人生产的产品越多，他的本质力量被资本家所占有的就越多。这就导致了工人越发贫穷，他所生产的产品最后又被资本家拿走后转化为资本，反过来继续统治他、奴役他，使他感受不到自己本质力量的存在。^[22]因为“工人生产的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的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技巧，工人越愚钝，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23]。

如果我们回到西方思想传统，会发现马克思在这里的论述是有其思想根源的。在洛克（John Locke）等人那里，所谓的所有实际上是人们对一些无主物注入了自己的劳动。在理想条件下，人必须借助自然界来实现自己的劳动的对象化——生产出劳动产品，这就能够占有外部世界，获得生活资料，使自己能够获得确认和满足。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通过对自然的改造，生产出了产品，但等待他的却是不幸。

规定二：生产活动（劳动的过程）与劳动者相异化。

马克思认为，劳动者与劳动之间的异化关系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劳动者（工人）与劳动产品的异化，这是从劳动结果的角度所作的考察；另一方面是劳动者与生产活动之间的异化关系，这是从劳动过程角度考察的。劳动异化的第一个规定是从劳动结果角度进行的。自然而然，马克思要讨论的是劳动者与劳动过程（生产活动）之间的异化关系。

从经验的角度来感受，生产活动应该是一种幸福得到满足的过程，因为，从生产结果看，劳动产品属于自己，自己的劳动得到了承认；从生产过程来看，由于没有外在压迫，生产必然是自由的，因而也是自在的和幸福的。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24]。

这时候，劳动已经不再是一种自我确证和自我满足，相反，它成了人们的负担，是劳动者“自身的丧失”。因为，资本主义造成的分工的加剧，使得人们并不能从事适合他兴趣的活动，因而也就会失去在劳动过程中的积极创造性，人的创造性劳动为异化劳动所代替了。虽然资本主义社会开始采用大机器，但是，本应该是人支配的机器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反过来开始支配人，人成了机器的一部分。^[25]而且在异化了的劳动过程中，人们感觉不到自己作为人的特征；在日常生活中，异化劳动所能够满足的也仅仅是自身最基本的动物性的欲望。^[26]

规定三：劳动者与他的类本质相异化。

物的异化仅仅是对人的异化进行论述的一种铺垫。马克思在讨论了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和劳动本身的异化之后，必然会追问劳动的所有者——人的异化问题。这就需要讨论：人在什么意义上讲是异化了的？为什么动物不存在所谓的异化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考察什么是人的本质。对此，马克思是从人与动物之间的区别开始的。

上文我们在讨论马克思思想的西方传统时已经讨论了这方面的内容。概言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处理人与动物的区别与亚里士多德区别人与动物一样，都以人这个类所拥有而动物所没有的特征作为标志。在马克思看来，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意识，在于人的类生活。

那么什么是人的类生活？马克思认为，人的类生活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因为动物和自身的生命活动是同一的，其生命活动停止，它也就不复存在，它不会产生对自身的认识，更不可能形成关于自我的意识。人则不同。人不但有生命活动，产生了意识，甚至把自身的生命活动当作意识的对象。这样一来，人的生命活动就不仅仅是生命活动，而且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所以马克思说：“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27]

但是，由于异化劳动，人们已经被降低为一种动物性存在，人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对于人而言已经成了一种奢侈，因为“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是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28]。

当人的类本质与人本身相异化的时候，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所应有的那种创造性也就不复存在了。因为人在改造自然界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主动性，对规律的把握和运用，都证明着自己是类存在物。异化劳动既然剥夺了劳动者的创造性，那就不仅仅剥夺了人对

自身身体的控制，而且还剥夺了他们的主动性，剥夺了人在改造自然过程中的能动性。所以异化劳动让人与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实质上导致的是一种全面的异化的出现。

规定四：人和人相异化。

通过对三个异化的规定，马克思自然而然地推导出了人与人的异化。因为劳动产品不属于工人，并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那么这只能是由于产品属于工人之外的他人。如果工人的活动对他本身来说是一种痛苦，那么这种活动就必然给他人带来了物质上的享乐和生活乐趣。如果说工人与劳动产品相异化了，那么工人也必然与占有产品的人相异化。也就是说，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跟劳动格格不入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同这个劳动的关系。工人同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或者不管人们给雇主起个什么别的名字）同这个劳动的关系。

关于异化的第四个规定，马克思的论述并不多，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因为思想上出现了短路，更意味着，马克思的异化逻辑出现了问题。我们毋宁认为，马克思的这种简要解释是因为其他的需要而中断了。如果我们对马克思这一时期其他文本进行考察的话，那么就能够发现马克思的接续之处。

三 | 《神圣家族》中的异化及资本家的异化

随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开始提出质疑。通过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本身的考察不难发现，在“异化”的四个规定中，马克思对前三个规定论述得比较充分。但是，马克思对“异化”的第四个规定却语焉不详。有的学者甚至认为“第四个规定显得太过间断，甚至可以说没作规定”。一些学者据此推断，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是一

个残缺不全的理论，因为异化的前三个规定的丰富论证与第四个论证的简略不成比例，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不可能从前三个规定推导出第四个规定，因而整个理论体系内部是不自洽的。比如，“人同自己劳动产品、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都可以在“自我异化”的逻辑体系内得到解释，而“人同人相异化”则完全超出了个体的“孤立人”的范畴，超出了主体和客体关系范畴，所以必须再引入一个主体。这就出现了“主体与主体、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逻辑，因而不能够达到逻辑自洽。^[29]

当然，作为一种学术探讨，我们可以作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解释。但在我们看来，这种辩护实际上夸大了“异化理论”内部的矛盾。首先，我们在马克思的文本中能够看到，即使是异化的第一个规定仅仅通过“自我异化”也不可能得到解释，因为“异化理论”本身就已经进行了前提预设，即必须是在私有财产的前提下才可能出现异化的问题。也就是说，人之所以与自己的劳动产品发生了异化，表面看来是“自我异化”逻辑发展的结果，但其根本的原因在于私有财产（私有制），而在这一概念背后实际上蕴含着另外一个“不在场”的主体。人与自己劳动产品的异化，从根本上说蕴含着人与人异化的因素。其次，对“异化理论”的整体结构，我们可以通过一种目的论的方式来理解。在整个“异化理论”中，前三个规定仅仅是作为推导出第四个规定的前提条件和逻辑步骤出现的，它们的作用主要是解释第四个规定的必然性。对此，我们可以在马克思讨论异化劳动之初就已经说明的事实，即“整个社会必然分化为两个阶级，即有产者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30]。马克思进而解释道，对这一事实，古典经济学虽然注意到了，但仍未给出足够强的解释理由。既然已经给自己设定了研究的目的，那么在“异化劳动”逻辑的结尾，就没有必要再加以重复说明。因此，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就是为了解释这一事实。

如果上面两点还不足以解释马克思第四个规定的论述篇幅问题，我们还可以结合《神圣家族》中的相关规定来分析。^[31] 我们根据文本的写作时间，可以推断《神圣家族》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几乎是交叉进行的。据此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还是在不断地发展着这一理论的。虽然在《神圣家族》中对异化的扩充发展并没有面面俱到，但是却明确地展示了异化的第四个规定是如何体现出来的。通过对《神圣家族》的解读，马克思对异化概念的分析是从它本身所包含的两个对立面来进行的，而这两个对立面相互作用的结果就是达到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共产主义。

在《神圣家族》中，埃·鲍威尔用青年黑格尔派的观点对蒲鲁东的《“什么是财产？”》进行了独特的解读，认为蒲鲁东此书是其本人自我意识的体现。鲍威尔把贫穷和富有看成是一个整体——绝对观念的体现，并企图把所有现实的问题在“自我意识”这样的抽象概念运动中来解释，把蒲鲁东反映现实关系和现实利益的学说统摄到他本人的绝对观念（即公平观念）中，并企图通过思辨来解决现实问题。这样，他达到了两个目的：（1）找到了其绝对观念的立足点——公平的观念，并把这一观念神圣化为类似神学中的上帝观念，也就是说，他的理论就有了一个“根本基础”；（2）在“整体本身”（亦即在现实存在）之外去寻找贫富对立的存在前提，也就是在绝对观念中寻找这一对立的前提，这是用表面整合为一体来掩盖实际的割裂——对贫富对立与私有制之间现实关系的割裂。

马克思从自己的视角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批判。马克思认为，贫富对立不能仅仅归结为一个抽象的整体，贫富之间的“整体对立无非是对立的两个方面的运动，整体存在的前提正是包含在这两个方面的本性中”^[32]。“整体”的对立两方面的本性就是其现实性，“整体”的存在首先是贫与富这些现实的对立的存在，二者之间对立是由私有制世界产生的，这个世界也是现实的世界。“无产阶级和富有

是两个对立面。它们本身构成一个整体。它们是私有财产世界的两种形态。问题在于它们二者在对立中所占有的特定地位。”^[33] 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把无产阶级和财富（有产者的符号）认定为私有财产的两个对立面，我们还知道，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私有财产与异化理论之间的关系，因而我们可以认定，马克思对无产阶级和富有者、贫和富之间对立的分析实际上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异化。

当然，马克思对上述结论也给予了论述。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认为：“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样表现了人的自我异化。但是，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幸福，感到自己被确证，它认为异化是自己的力量所在，并在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消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这个阶级，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在被唾弃的状况下对这种被唾弃状况的愤慨，这是这个阶级由于它的人的本性同作为对这种本性的露骨的、断然的、全面的否定的生活状况发生矛盾而必然产生的愤慨。”^[34] 正是通过这种人的自我异化，马克思才得出了无产阶级是扬弃私有制的动力源这样的结论。

这里马克思对人与人的异化进行了补充说明。异化已经不仅仅是工人的异化状态，而且还牵涉到了资本家，虽然在这里，马克思认为资本家的异化是一种“幸福和确证”，但是这种状态也是异化的，因为既然工人和非工人之间是一种对立状态，也就意味着他们会同时遇到一些现象，而异化则是这种现象之一。所以马克思论述说：“凡是在工人那里表现为外化的、异化的活动的东西，在非工人那里都表现为外化的、异化的状态。”^[35] 对于无产阶级（亦即劳动者）的异化，一般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的疑惑可能是，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资本家也是异化的？美国学者奥尔曼对此进行了详细论证。

奥尔曼认为，虽然无产阶级与自己的劳动产品之间是一种异化的状态，但同时资本家与无产阶级的劳动产品之间也可能让他处于一种异化状态。在奥尔曼看来，虽然资本家作为私有财产的所有者占有了其他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但是这些别人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产物对他而言也仅仅是一些要去出售的东西。产品对他而言也只有工具性，用它们来获得利润。资本家的这种占有是一种非实质性的占有，是一种虚假的占有，因此就像他不但对它的产生过程漠不关心，而且对产品实际上用作何用以及谁最终会使用它也漠不关心。

当然，私有制条件下的资本家也照样受到了他所在的社会条件所支配，必须参与到资本主义的竞争中来，根据市场需要来进行生产和交换。在马克思的体系中，竞争也是生产本身的一种结构性关系，与生产是紧密联系的，这就要求他必须时刻关注产品的质量，以便让自己占有的商品能够及时地换成金钱。竞争的压力让他所付出的代价与工人一样大，让他时刻面临着被更大资本家吞并进而滑入无产阶级行列的危险。这就要求资本家必须被迫去适应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中人对人是狼的残酷现状之中。他们必须根据市场的需求来生产产品，在产品的数量、独特性以及销售渠道等方面不断做出调整。因此，从作为产品的所有者这一角度来看，资本家同样受到了他占有的产品的控制。

我们在从资本家作为消费者这一角度来分析资本家的异化。毫无疑问，作为自然界中的一员，他首先需要满足的是自身的身体需求，这种需求要求他必须从市场上去购买商品，而不能自己生产所有的商品。因此，资本家就和工人处在了同一起点上，他们都要受到能够买什么以及市场能够满足什么这样的限制，不同的仅仅是他能够买的数量更多一些，种类更丰富一些。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即资本家不可能用他获得的利润去满足自身的全方面的需要，因为

追逐利润的本性驱使他充分利用这种财富来扩大再生产，而不是满足自身的需求。^[36]

当然，我们还要回到马克思关于第三个异化规定的论述。我们知道，对自然界的改造是体现人的类本质的关键。对于人而言，改造自然界应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这种“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世界”^[37]在马克思看来，正常的状态是既具有理论的认识，也应该有实践的创造。因为改造自然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认识自然规律，并根据这些认识到的规律按照人的需要进行创造的过程。但是，资本家仅仅具有一种“理论的态度”，他们不会把认识直接应用于改造实践，同样工人则仅仅是一种“现实的、实践的态度”。即使如此，无产阶级的实践态度也被异化了，资本家的理论态度更是一种异化的态度，因为它根本就没有反映这种“现实的、实践的态度”，因为在实践领域，资本家是不在场的，当 they 与实践发生脱离的时候，也是他们发生异化的时候。^[38]

资本家和工人同样，也表现出了道德堕落。在“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这一节的末尾，马克思论及到了这样一段话：“凡是工人做的对自身不利的事，非工人都对工人做了，但是，非工人做的对工人不利的事，他对自身却不做。”^[39]资本家的对财产的掌握让其具有了支配别人的权力，防止了通过工人那种积极的自我异化而蒙受羞耻。但是，他把工人当作剥削对象导致了他自身像工人自身那样的畸形发展。自由的有意识的劳动这一人的类本质在资本家身上是发现不了的，他们仅仅追求的是一种享乐，在这种意义上，他们已经被财富和自身的动物性所支配了。

纵观马克思的异化规定，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异化劳动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是核心，这个理论的论述也是充分的、全方位的（把《神圣家族》的相关论述囊括其中）。尤其是，异化的第四个规定，即“人与人相异化”作为异化理

论的最终旨归，其论述也是充分可信的。只不过，马克思在对异化劳动的论述中，既包含着实证研究的要素，也有黑格尔思辨推理的印痕。或许正是这种方法论上的纠缠，让人们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产生了过多的联想。

四 | “异化”与私有财产之关系

既然讨论了异化劳动，那么就要追问异化劳动的根源，因为只有了解了异化劳动的根源，才能够找到解决这一现象的方法。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根源追溯到了私有制（私有财产）。^[40] 因为马克思在分析异化劳动时，就已经明确指出，他的分析是以“私有财产……等等当做前提”的。^[41] 但是人们往往会追问，既然私有财产导致了异化劳动，那么又是什么导致了私有财产呢？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私有财产的根源又归结为异化劳动，因为正是异化劳动创造出来的产品为资本家占有之后，才能够获得利润，而资本的利润，基本上又可以看作是异化劳动的产物。似乎看来，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循环论证。我们把这段文字摘录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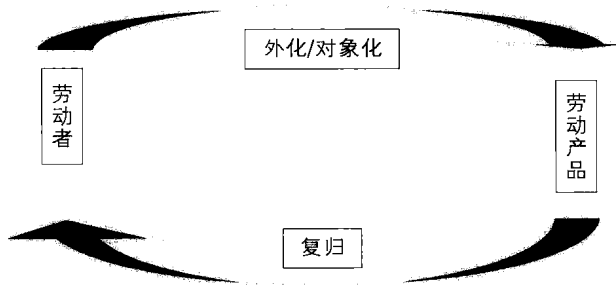
“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跟劳动疏远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对这个劳动的关系。工人对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或者不管人们给劳动主宰起个什么别的名字——对这个劳动的关系。因此，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同自然界和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因此，我们通过分析，从外化劳动这一概念，即从外化的人、异化劳动、异化的生命、异化的人这一概念得出私有财产这一概念。诚然，我们从国民经济学得到作为私有财产运动之结果的外化劳动（外化的生命）这一概念。但是，对这一概念的分析表明，尽管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

因，但确切地说，它是外化劳动的后果，正像神原先不是人类理性迷误的原因，而是人类理性迷误的结果一样。后来，这种关系就变成相互作用的关系。私有财产只有发展到最后的、最高的阶段，它的这个秘密才重新暴露出来，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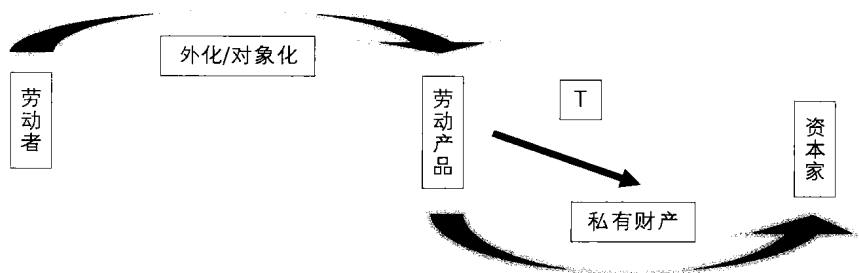
我们看到，马克思在这段话中，既把外化劳动当成了私有财产的“根据和结果”，私有财产是工人外化劳动的对象化，同时，马克思还把私有财产看作是异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亦即，只有在私有财产条件下，才可能出现“异化了的”劳动。由此，马克思这里似乎真的遭遇了“循环论证”问题。

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在分析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关系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我们曾对外化和异化所作的区分，即外化劳动仅仅是一种把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异化劳动则意味着，人（劳动者）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了，但是这种对象化后的具体产品并没有回归自身。我们可以图示说明二者之间的区别。

图示 A：外化劳动



图示 B: 异化劳动



在上面的两个图示中，我们看到图示 A 表明，劳动虽然外化，但是因为没有私有财产的阻断，所以，劳动外化的对象——劳动产品回归到了劳动者自身；在图示 B 中，由于私有财产的阻断，工人外化的对象劳动产品，转移到了资本家那里，没有回归劳动者（工人）。也就是说，是私有财产导致了实质性的异化劳动的出现，或者更精确一点说，在私有制的条件下，劳动产品才不可能回归，才会与工人发生异化（疏远），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出现的必要条件。没有私有财产，就没有异化劳动。但是，私有财产必须有一个产生过程，也就是图示 B 中的箭头 T。箭头 T 表示：当劳动者外化自身的本质力量形成劳动产品之后，劳动产品转化为私有财产。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外化这一过程是必然的（因为图示 A 和图示 B 都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那么箭头 T 这个过程应如何界定？

这需要引入历史的维度。如果仅仅在逻辑上分析，那么在这里必然会陷入一个论证上的死循环。如若引入历史维度，那么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而且这也是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创造性发挥之一。^[43]

我们可以从“异化劳动”这一节向前追溯，分析一下马克思对地租的分析，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地租是最早的私有财产。我们知道，社会发展史基本上遵循的是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这样的趋势，这一社会发展趋势的经济表现是，资本对土地的胜利，

是资本的利润代替地租，或者说是地租也逐渐转化为资本的利润。那么我们试看，私有财产是不是在封建社会也同样存在？如果存在，那么我们可以继续分析封建社会的私有财产和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有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如果二者之间存在着区别，那么基本上就能断定，是劳动首先产生出了私有财产，如果二者之间不存在区别，那么则是私有财产决定了劳动的性质，即确定它是不是异化了的劳动，因为私有财产在时间上是先于异化劳动的，前者出现于封建社会，后者出现于资本主义社会；如果封建社会不存在私有财产（尽管在现实中这是不可能的），那么这就会导致一个伪命题，因为封建社会本身的含义就已蕴含了私有财产的存在。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私有财产是存在的。他认为：“私有财产的统治一般是从土地占有开始的；土地占有是私有财产的基础。”^[44]但是，在这种私有财产条件下，虽然“封建的土地占有已经包含土地作为某种异己力量对人们的统治”，但是这种异己性是不明显的，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这种异化劳动是不存在的。而且，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论述是，劳动产品完全为资本家拿走，但在封建社会，劳动者的部分产品还是回归到了劳动者本人的。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认为异化劳动是先于私有财产的。

当然，我们还可以分析，如果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过程中，潜在的财产的所有者先用地租获得的收益来购买劳动力，进而导致了异化劳动，那么这是不是可以认为是先有私有财产，后产生异化劳动呢？亦非如此。因为在这一购买过程中，私有财产还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导致异化劳动的私有财产。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私有财产必须是从对异化劳动的剥夺中获得的财产。因此我们的结论可以是，先有异化劳动，后出现私有财产。

我们必须承认，广义的私有财产在逻辑上具有优先性。但是，马克思所论述的私有财产，即作为“外化劳动的产物”的私有财产，

则是后于异化劳动出现的。当然，如果我们在分析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关系时，如果在私有财产前面加上“资本主义的”这样的限定词，或许人们就能够达成一致。

我们当然还可以结合马克思晚期的文本来考察。我们认为，马克思之所以把（异化）劳动放在优先位置，因为是劳动创造了一切。马克思在晚期的文本中提出的劳动价值论实际上就是试图用劳动来解释一切社会不平等现象，并把劳动看成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这样做的目的除了逻辑上的要求之外，还有现实的考虑，即工人的劳动创造了一切，那么这一切也应该由工人来占有，如果不是这样，则这种分配和占有制度就是不公平的，需要加以革新。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劳动首先是外化劳动。

【本章注释】

[1] 王东、刘军：《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源头活水和思想基因——〈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新解读》，《理论学刊》2003年第5期。

[2] 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II），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137页。

[3] 概念的学术史梳理是西方学者做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当然，中国古代学者也有类似的方法。

[4] 弗洛姆的考证是：“异化思想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西方传统的早期阶段，即渊源于旧约预言家们的思想中，特别是他们的偶像崇拜这个概念中。”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0页。

[5] 因此，洛克在《政府论》中讽刺霍布斯说：“他们注意不受狸猫或狐狸的可能搅扰，却甘愿被狮子所吞食，并且还认为这是安全的。”实际上，这种国家统治下的人民的生存状态比自然状态还要差。参见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7页—第58页。

[6] 卢梭：《爱弥儿》（上册），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1页。

[7] 王若水：“异化——这个译名”《读书》，2000年第7期，第149页。

[8] 王若水：“异化——这个译名”，《读书》2000年第7期，第150页。

[9] 《费尔巴哈著作选集》（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9页。

[10] 《费尔巴哈著作选集》（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4页。

[11] 城冢登：《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劲草书房1974年版，第307页。
转引自韩立新：“从费尔巴哈的异化到黑格尔的异化：马克思的思想转变”，《思想战线》2009年第6期，第69页。

[12] 我们还可以通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这两个文本中的一段话来表明马克思思想的“稳定性”。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说：“尽管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但确切地说，它是外化劳动的后果，正像神原先不是人类理智迷误的原因，而是人类理智迷误的结果一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6页）。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几乎说了同样的话，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这种对立的形式是必须经过的，正像人起初必须以宗教的形式把自己的精神力量作为独立的力量来与自己相对立完全一样。这是人本身的劳动的异化过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9页）

[13]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题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写于1840年下半年到1841年3月。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7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2页。

[17] 当然，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的自我意识之间还是存在着差别的。在青年黑格尔派那里，自我意识就是一种要吞并一切的赤裸裸的主观精神，而马克思的自我意识则是通过思辨形式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理论表达，是在抽象形态上对人和自然真实关系的一种把握。这基本上可以看作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人的对象性活动的思想萌芽。

[18] 王若水：《在哲学战线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70页。

[19]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异化的前两个规定“所谈的是物的异化”。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0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6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6页—第157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8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9页。

[25] 相关的论述参见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II)，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197页。这一思想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得到了非常充分的论述和展开。

[2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0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2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3页。

[29] 韩立新：“《穆勒评注》中的交往异化：马克思的转折点”，《现代哲学》，2007年第5期，第5页。当然，对于结论性的内容是不是必须大篇幅的论证，这仍然是需要讨论的。因为，根据常识，结论一般是前面论述的一种判断，其依据已经存在于前面的论证之中了。

[3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5页。

[31] 在分析之前，我们先结合他人的分析，认可这样一个结论，即“人与人相异化”可以视为一种阶级的异化，即有产者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异化。对于这一点，日本学者山之内靖也是认可的。参见山之内靖：《受害者的目光：早期马克思的复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92页。我们之所以要认可这样的结论，主要目的在于：(1)把马克思的“人与人相异化”具体化为“有产者阶级与无产阶级相异化”，(2)找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之间的逻辑关联。

[3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0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0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0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8页。

[36] 这几段的论述主要参考了奥尔曼先生的《异化》一书，尤其是此书的第23章。奥尔曼：《异化：马克思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概念》，北京

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3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62 页。

[38] 相关论述及引文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69 页。

[3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69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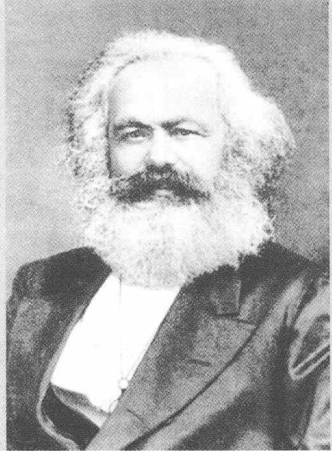
[40] 在德文和英文中，私有制和私有财产是一个词 *Privateigentum*，英文是 *private property*。

[4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55 页。

[4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66 页。

[43] 实际上，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还有另外一个创新，就是把黑格尔对劳动的异化（真正的本质是自我意识的异化）改造成了真正的经济学或实证意义上的异化。

[4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50 页。



第四章

共产主义与人的解放

我们在描述了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并分析了马克思的主要思想之后，马克思的核心思想逐渐呈现在我们的思想中并清晰了起来。这一思想在马克思少年时代就已经非常突出，而且这种思想一直贯穿马克思一生，在他的著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我们在这里可以简要地对这一思想进行一个描述，那就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对于这一命题，我们可以分别在马克思的早期、中期和晚期的著作中发现一些证据。在早期，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就表明了一生的志向，“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1]；在中期，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认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在晚期，他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也广泛谈到了自由问题，当马克思在本书中讨论未来社会形态时，认为“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3]。

如果说早期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讨论及其解决都是以“人”为中心的话，那么到了唯物史观确立之后，人仍然是马克思研究的出发点和最终依归。比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讨论唯物史观起点的时候，就是把“现实的人”作为逻辑和现实基点的。据此我们基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人的问题”应该是马克思的核心问题域。

但是，马克思不仅仅是关注“人的问题”，更要解决“人的问题”，这就要求他必须对这一问题产生的根源和解决路径给出论证。如果用上面这些观点来衡量《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人的问题”就是异化劳动问题，而这一问题的根源是

私有财产，解决之道则是共产主义。本章主要解决的就是这三者之间的逻辑联系，梳理马克思的论证思路。

一 | 私有财产与人的问题

杜威在《人的问题》一书的序言中引用了英国诗人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描写现代人的诗句：（现代人）“正徘徊于两个世界之间，一个世界已经死亡，而另一个世界尚无力诞生。”^[4]这句话揭示了现代人所面临的困境，即在价值丧失的现代背景下人们无所适从的窘境。这一窘境就是现代性所带来的“人的问题”。毫无疑问，如果把“人的问题”简单归结为“现代人”，那么这会陷入一种抽象的人性论假设，也就是认为在现代社会中所有人普遍存在着这种丧失意义的问题。不难看出，不同的学者对现代性以及现代社会中“人的问题”的理解存在着偏差，即如果说以韦伯等人为首在自由主义对现代性的解释是，认为现代性中“人的问题”实质上是一种合理性（或者说工具理性）的扩张问题，那么马克思对“人的问题”的关注则具体得多。在马克思看来，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私有财产问题。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学的角度对“人的问题”进行了解释，并提出了自己的解决之道——共产主义运动。

关于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之间的关系，我们已经进行了论述，即：异化劳动导致了私有财产，而私有财产又导致了人进一步的异化。但是，私有财产与人的问题之间的联系，则需要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作为中介，即：（异化劳动→）私有财产→异化劳动→“人的问题”。对于这三个概念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这样来看，是私有财产根本上导致了“人的问题”的出现，但是这个问题需要通过“异化”来体现出来。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异化及其人的悲惨处境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但是我们还可以在《神

圣家族》中找到一些补充证明的材料，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神圣家族》结合起来进行考察，用一种经验的描述来分析“人的问题”的种种表现。换言之，我们需要看一看马克思视野中的“人的问题”究竟是什么。

第一，“人的问题”在物质上表现为无产阶级普遍的、绝对的贫困，在精神上表现为他们主观精神状态的恶化。马克思对西方社会中人（尤其是无产阶级）的悲惨问题进行了翔实地描述。如果说，人的自由发展是马克思一生中最重要的价值维度，与之相对应的则是马克思对人的贫困状态和畸形发展的关注和焦虑。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对人的“异化劳动”所导致的贫困进行了相关论述，这是对“人的问题”的最好证明。对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而言，关于“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就是对“人的问题”的现实写照和哲学分析。如果说异化劳动的后两个——人与类本质的异化和人与人的异化——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人对自身的否定的实质和在社会中的具体体现，那么前两个规定（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和劳动行为本身的异化）则说明了这种异化状态在作为个体的人的身上的生动说明。我们说贫困是普遍的，是指绝大多数工人都处于贫困生活之中，即使是古典经济学家比雷等人都认为“贫困的人口随着贫困的增长而增长；最大量的人在极端贫困的状态下挣扎，彼此争夺着受苦受难的权利”^[5]。我们说贫困是绝对的，是因为无论社会处于什么样的状态（社会财富是否增长），无产阶级都会处于贫困状态之中，这样的贫困“对工人说来却是持续不变的贫困”^[6]，劳动者的贫困与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无关，只与资本主义这种制度有关。

“人的问题”既有物质方面的表现，也有精神层面的表现。科尔纽就认为，当无产阶级面对贫苦并感到自己被剥削时，他们的内心不满会“发展为对自己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的憎恨和愤怒，也发展为

对非人化的制度的憎恨和愤怒”^[7]。无产阶级的愤懑与无奈在某些时候转化为反抗不公正的社会制度行为，但更多的时候是陷入到了绝望之中，因而不得不选择宗教来麻醉自身。

第二，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问题”还表现为由于贫困等原因所导致的道德水准下降等社会问题。马克思深刻地指出，贫困绝对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它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因为贫困必然会导致其他社会问题的出现，比如普遍的“公妻制”——卖淫问题。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而言，一切都是可以变卖的。随着都市人们去追求那些具有购买力的东西——金钱，人们必须占有这些具有普遍性的东西才能脱离贫困，它的普遍性就在于它是“普遍牵线人”。为了金钱，人们可以不顾一切社会道德和法律制度的约束，因为只有有了金钱，人们才能生活下去，没有金钱，人就等同于无。在金钱面前，资产阶级社会条件下的道德是苍白无力的，因为“如果我根本不存在，我又怎么能有美德呢？如果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又怎么会富有良心呢？”^[8]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金钱宰制了一切，包括社会道德和社会行为以及审美标准。人们的价值标准已经不再根据人本身，而是根据物——金钱，因为虽然“我是一个邪恶的、不诚实的、没有良心的、没有头脑的人，可是货币是受尊敬的，因此，它的占有者也受尊敬……我是没有头脑的，但货币是万物的实际的头脑，货币占有者又怎么会没有头脑呢？再说他可以给自己买到颇有头脑的人，而能够支配颇有头脑者的人，不是比颇有头脑者更有头脑吗？”^[9]总之，异化和私有财产导致了贫穷，而贫穷所导致的对金钱的渴望则导致了金钱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

随着对金钱统治地位的描述，马克思也逐渐揭示出了这样一个现象，即在资本主义社会，不是人统治物。“人的问题”表现得尤为极端，那就是人的主体性逐渐丧失，人开始成为物，同时作为机器的一部分，他只能固着在机器上，这就会导致人的片面发展。

第三，我们要注意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与资本的本性是相关联的，亦即与私有财产的属性紧密相关。我们说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的普遍性是指“异化”影响到了社会各个阶层。比较明显的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着重强调的是无产阶级的异化问题，但资（有）产阶级本身的异化问题也不是没有涉及（前文已经有所论及）。因而，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论述到，“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但有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感到自己是满足的和稳固的，它把这种异化看作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10] 虽然，资本家在异化当中并没有感到一切不自在，但是他们却也是处在无所不在的枷锁中的，因为资本家作为资本的代言人，必然受到资本的驱使和支配。随着资本家的异化，整个社会中的人均处于异化之中，“异化既表现为我的生活资料属于别人，我所希望的东西是我不能得到的、别人的所有物；也表现为每个事物本身都是不同于它本身的另一个东西，我的活动是另一个东西，而最后，——这也适用于资本家，——则表现为一种非人的力量统治一切”^[11]。

第四，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存在的“人的问题”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绝对对立。在以前各种社会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并不是截然相对的，比如在封建社会，马克思就认为农奴对封建主之间存在着人身依附关系，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压迫性的，但他们之间的对立并非完全绝对的。农奴所面对的并不是某个阶层，他的对立面实际上是具体的领主，他们都具有独立个性，而且这些个性还表现在了对土地的世袭和占领上。但是资本主义社会则不然，在这个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对立是绝对的，他们的生活状态也是完全对应的。马克思认为：“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

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12]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问题”几乎成了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一切东西，只能归于资本家，而工人则只能一无所有。

当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人的问题”的论述还不止这些。关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非工人的“理论的态度”和工人的“现实的、实践的态度”等问题都可以视为“人的问题”的具体表现。

通过分析不难看出，诗人所说的处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现代人处于两个世界之间的论断已经不成立了，因为在资本的驱使下，社会已经发生了急遽变化，所有人都随着社会的变化而被动地转变着自己的身份，这种被迫、无奈以及某些浪漫主义者对封建社会的“乡愁”，已然随着历史的洪流卷入到了资本主义汪洋之中。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人的问题”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

● 英法空想社会主义与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

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问题”这一困境，马克思可以说是用了毕生精力去寻找出路并为之论证的。在法国大革命影响深远的时代，通过社会革命的方式来解决人的问题成了人们最佳的选择。相应的问题是，哪一种社会革命才具有合法性，哪一种要素享有了为社会发展做出决定的权力，为什么是这个要素而不是另外一个要素？

在对上述问题回答的过程中，出现了两种答案：一种是启蒙叙事，一种是思辨叙事。启蒙叙事所撷取的革命主体是人类本身，因

为人类是自由的英雄，他拥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在启蒙叙事中，革命的合法性来自人民，比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就是其中代表之一。思辨叙事强调，革命的主体应该是精神，精神是“生命”，而德国唯心主义的意识哲学就是主体——生命的必然选择，现实的发展和历史的演化都是精神的自我呈现和自我表达。

我们还是要看到马克思的综合性。马克思既没有完全排斥启蒙的话语，也没有完全拒绝思辨的叙事。毋宁说，马克思将启蒙的话语和思辨叙事进行了结合，也就是说，马克思把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和德国的“真正的人道主义”进行了批判、综合和吸收。

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吸收了欧洲哲学的唯物主义合理因素。在欧洲，唯物主义主要分为两支，一支是以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孔狄亚克、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为代表的法国唯物主义，另一支则是以洛克、边沁等为代表的英国唯物主义。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二者最终实现了合流，这种合流在政治上的体现就是空想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在讲到空想社会主义的时候，就不仅仅是法国的傅立叶、圣西门，还会介绍英国的欧文。

对于这种空想社会主义之基础的唯物主义，我们首先要介绍一些它们的基本哲学观点，并分析在何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空想社会主义是对这些唯物主义要素（哲学观点）在哲学生活和历史领域内的应用，以及在什么意义上马克思认可了这样的观点，即：“关于人性本善和人们智力平等，关于经验、习惯、教育的万能，关于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关于工业的重大意义，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的唯物主义学说，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13]

我们可以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中来分析一下他们的理论的唯物主义基础。首先是傅立叶，马克思认为他是“直接从法国唯物主义的学说出发的”，而这种法国唯物主义学说，主要是爱尔维修的观点，即以肉体的感受性作为基础来说明人以及人对利益的

追求，二者也构成了社会历史理论的基石。傅立叶对历史理论的贡献（也是对社会主义理论的贡献）是，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诸多弊端，认可社会历史向前发展的趋势，而最终将历史的发展动力定位于人性本身对幸福和快乐的追求。因为在他看来，一个合理的社会不应该是压抑人性的，应该尽可能满足人们基于自身的本性所产生的欲望。德萨米和盖伊等人也把所谓合乎人性的原则——比如幸福、自由、平等、博爱等——当作是共产主义的基础，这就把人道主义与共产主义结合了起来。当然，还有马克思一度批评的巴贝夫也是强调平等，主张一种绝对的平均主义。至于英国的欧文，则是直接把功利主义者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看作是评判一个社会制度的标准，要求理想的社会制度应该人人平等。^[24]

实际上，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与唯物主义的联系我们可以归结如下：它是从感性世界的经验出发，把基于此的避苦求乐看作是最合乎人性的内容，这就让社会中的个体能够把自身看作是一个合乎理性的存在；社会道德应该以利益作为判断标准，也就是说，只有符合最大多数人利益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说共产主义是合理的，因此，任何一种道德都应该让个体利益服从于全社会的利益；共产主义应该把人看作是社会动物。

对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来说，他们在价值取向上也存在着一些差别。巴贝夫这个人就因为过于强调平等而陷入到了绝对平均主义之彀。傅立叶强调的是社会的和谐，因此他在设计他的“法郎吉”（phalange）的时候，侧重这个组织内部各种成员之间的比例，因而他也不会要求去废除私有制。当然，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非常尖锐的，尤其是集中在工业方面，因此他更强调农业，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大工业及其私有财产是破坏人们道德和政治制度的根源。但圣西门与其他人不同，他强调的价值是平等。在如何实现平等的问题上，圣西门所设计的未来制度是“实业制度”或“科学和实业制

度”，因而他强调一定要发展实业，让那些有实业能力的资本家来治理国家。发展实业就能增加社会财富，只有社会财富增加了，才能够增加人们脱离贫困的可能，进而改善工人的状况。

正像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序言”中所说的那样，马克思对德国的社会主义也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和吸收。在这些社会主义研究者当中，最著名的要算是魏特林、赫斯和恩格斯了。在这些德国社会主义作家中，他们的观点虽然很大程度上吸收了法国社会主义的一些观点，但在很多方面还是存在着显著差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德国社会主义的哲学色彩更浓，而法国的社会主义者更强调政治制度的设计。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德国这三位社会主义者的著作来理解德国社会主义与法国社会主义的差别，指出德国社会主义对马克思的影响。

魏特林关于社会主义的代表作是《和谐与自由的保证》。在这本书中，魏特林首先介绍了社会病态产生的原因，分别对私有财产、金钱、爵位以及诸多阶级社会中的不正常现象进行了解释，认为工人贫困的原因是劳动和社会财富的不平等分配造成的，认为“私有财产是一切罪恶的根源”^[15]。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他随后开始探求一个社会改革的理想，意欲建立一个自由、和谐和进步的社会。他认为：“在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里只有一个规律是永久不变的，那就是进步的法律，它是社会的自然法则”^[16]，只有通过进步，社会才能够实现和谐和自由。与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不同，魏特林在具体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提出了一些富有创造性的思想，比如“过渡时期”理论。^[17]更重要的是，魏特林提出了通过社会革命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观点。虽然这种观点饱受批评，但是魏特林仍坚决指出：“至于这个革命是否只是单凭纯粹精神的力量去取得胜利，还是要配合上物质的暴力，我们必须等着瞧，并且无论如何对这两种场合都有所准备。”当然，这种道路选择在魏特林那里是随着形势的

变化而改变的，“在平静的时期我们就宣传教育，在暴风雨里，我们就起来行动”^[18]。应该说，这种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对于马克思影响还是很大的。

赫斯是另外一个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人。在近几年的研究中，人们普遍认为马克思在1843年—1844年这段时间内受到了赫斯思想的巨大影响，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也是如此。那么赫斯的主要思想是什么呢？赫斯的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宗教社会主义、哲学社会主义和伦理社会主义（即“真正的”社会主义）。在宗教社会主义阶段（1837年前后开始），赫斯通过其处女作《人类的圣史》一书论说了历史发展的规律、资本主义的特点以及社会主义的本质。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赫斯将之理解为“和谐”、“统一”和“平等”的“财富共同体”，认为这些构成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和要素。实际上我们不难看到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比如傅立叶的“和谐”和圣西门的“平等”）对赫斯的影响。因为这一时期赫斯对社会主义以及历史规律的论述主要与宗教联系在一起，认为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拯救史，社会主义就是“圣王国”和“新耶路撒冷”，因而具有一种宗教的命定论色彩。赫斯的第二个思想发展阶段可以称之为哲学社会主义，这大致是从1842年年初开始，1843年年初结束。在这一时期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发表于《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的几篇论文中，即《行动的哲学》、《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以及《唯一而完全的自由》。还有一篇题为《欧洲三同盟》的论文处于赫斯从宗教社会主义向哲学社会主义过渡阶段，对这一时期的思想也有所体现。赫斯在这些著作中描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一些特征——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是劳动和享乐的统一，是必然性向自由的转化——而且还对社会主义的必然性进行了论证，提出了人的“二重化”（das Dualismus），认为二重化就是个体与普遍的对立，社会主义必然要

求这些对立必须扬弃。此外，赫斯还通过对货币的本质的论述，从经济学方面论证了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不过这一时期赫斯在关于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方面还强调一种社会改革，而非革命，并在这一过程中赋予了哲学理论以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赫斯的最后一个思想发展阶段是伦理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它主要是1844年年初开始日益发展成熟的。这种哲学思潮强调社会主义的特征是：泛爱论、宗教说和改良主义。泛爱论是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爱的状态。赫斯认为，此前的社会都是充满了矛盾和仇恨的社会，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是“爱的新世界”，爱的原则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观念表现。宗教说是指，社会主义学说不仅是一种最高的科学，也是一种最高的宗教，社会主义者不应仅仅是哲学家，也应该是传教士。改良主义则是针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实现途径而言。赫斯要求社会主义的实现应该采取社会改良的方法，而最好不要诉诸革命，因为“采用暴力和突袭的方法来废除目前的所有制关系，则必然造成不利影响”。因此，他把希望寄托于教育，认为“合乎理性的私有制以合乎理性的社会为前提，而合乎理性的社会又以受社会教育的人为前提”^[19]。我们在后面会看到，赫斯的这些思想却是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观点非常切近，而且有文献表明，赫斯的思想严重影响着马克思。

但是，真正对马克思影响深远的还是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就曾提到过这本书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影响。恩格斯与德国的一般社会主义者不同，他的这本书不仅不停留在哲学的论证上，而且还通过经济实证材料分析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及其对私有制的辩护，论述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和影响，分析批判了它的主要范畴。与此同时，恩格斯还指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罪恶都源自于私有制，源自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此必须消灭私有制，对当时的社会制

度进行全面改革，只有这样才能消除资本主义的弊端。这篇文章对马克思的影响，不仅仅在于揭示了上述社会实质，论证了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也为马克思转变自己的研究思路，推动他从黑格尔派的哲学思辨研究方法转向经济实证研究方法，实现了一种研究范式上的转变。正是在这篇文章的推动下，促进了马克思研究领域的转型，促进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合作。

如果我们对 18 世纪、19 世纪的社会主义思潮进行归纳总结，很容易发现其中有很多合理因素，包含着对当时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的批判，揭露了社会的不平等，提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发展路径，并设计了一些理想制度。这些思想都对马克思走向唯物史观产生了重要影响，没有这些思想的推动，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能出现的。但也毋庸置疑，这些社会主义思潮的作用是历史性、阶段性的，对于它们，马克思在充分吸收之后很快就实现了超越。这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经逐渐有所体现了。

三 | 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之谜的解答”

我们这一章在讨论私有财产的本质的基础上得出了是异化劳动导致了私有财产的产生，而私有财产又进一步加剧了人的本质的异化，导致了现代社会中“人的问题”的出现。我们随后之所以要讨论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和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厘清在马克思之前思想家是如何解决“人的问题”。在这个问题的解决过程中，社会主义者基本上都看到了私有财产黑暗面以及它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影响。但是，他们仅仅从一种空想或思辨的角度分析未来理想社会，这就导致他们不可能对“历史之谜”作出真正的解答。

“历史之谜”实际上是一个费尔巴哈式的术语，它在《1844 年

《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是指“从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社会的客观矛盾的发展中得出共产主义必然性的结论”^[20]。这样一来，历史之谜的解答实际上就是对共产主义运动及其本质进行论证说明。

关于共产主义的理论，马克思的观点受到了空想社会主义和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影响，但是影响最大、最直接的可以说就是赫斯和恩格斯。对于恩格斯，我们一般把他看作是共同创建唯物史观的同路人，而且马克思也论述过恩格斯对他的影响。我们可以说，在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位伟大的思想家那里，他们一生都是相互影响的。我们这里要讨论的是赫斯对马克思的影响以及马克思如何改造这些理想并用来解释历史之谜，即共产主义运动的。

一般认为，赫斯接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概念要比马克思早。如果赫斯的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是否产生了影响仍需要讨论的话，那么他对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影响则是直接、明显存在的。我们在上文谈到了赫斯本人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的论述，即宗教社会主义、哲学社会主义和伦理社会主义（即“真正的”社会主义）。此外，赫斯还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过更为详细的论述，即：以巴贝夫为代表的粗陋的社会主义，以圣西门、傅立叶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和“最新的”社会改革者和共产主义者为代表的“科学共产主义”。^[21]赫斯的这种论述直接体现到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中。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也论述了共产主义的三种形式。

第一种共产主义的形式是“粗陋的共产主义”，它的本质在马克思看来就是“私有财产的卑鄙性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私有财产力图把自己设定为积极的共同体”^[22]。我们看到，马克思将这一形态的共产主义视为是粗陋的，这是因为持这种观点的共产主义者虽然谴责私有财产，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认识私有财产的本质，因而也

就不能克服私有财产对人的统治。以巴贝夫为首的共产主义者认为，人们应该克服私有财产的特殊性，但是他们用一种共同性（这是一种想象的普遍性）来取代私有财产的特殊性，然而，这种特殊性并没有被真正克服。这种共产主义的实质只不过是把私有财产所代表的私人占有普遍化了，也就是说，只不过是每个人都是私有财产的占有者，而没有真正克服私有财产的私人性质。

第二种共产主义的形式是“还具有政治性质，是民主的或专制的”共产主义^[23]。正像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他们都认识到了私有财产的恶劣行径，看到了人的异化，甚至主张废除国家，但是却没有看到私有财产的积极本质，因此也不可能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

第三种共产主义的形式是作为“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的共产主义^[24]。这种共产主义是马克思所接受的共产主义，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也就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25]马克思之所以对这种共产主义持有一种积极认可的态度，就在于它揭示了私有财产的本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终价值追求。

我们知道，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已经异化为一个阶级对立的社会（即异化的第四个方面——人与人的异化的最重要表现）。在这个社会中，异化最初的结果是使劳动者的产品与劳动者对立起来，劳动产品为富有者所占有，其最终结果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异化，即富有者（有产阶级）与贫穷者（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状态——前者对后者的压迫，对他们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的剥夺。马克思在对共产主义分析之前，首先把私有财产和人与人的异化进行了总结分析。他认为，私有财产有两个对立面，一是它的肯定方面——有产阶级，一是它的否定方面——无产阶级。根据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理论可以知道，私有制的这两个方面——

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是人的自我异化的结果。这是马克思对私有制的最根本的解释。前者是人的自我异化，是因为富有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现实利益，总是力图保持自身，来保持自己的对立面（无产阶级）为他们创造财富，他们在异化中感到的是满足和强大，但是他们并没有因为自身的强大而充分地体现了人的类本质，而是相反，他们获得的只不过是人的生存的外观而已，这对于私有制而言，有产阶级对自身的肯定和强大的证明是对它自身的一种肯定和自我满足，是其本身赖以维继的保证，因为富有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外观而不得不努力地维护私有制的存在；而后者则不同，无产阶级在自我异化中失去了自己的类本质，他们在异化中感到的是自己处境的悲惨和被毁灭、被奴役的命运，甚至失去了那些合乎人性的外观。这都是他们在自我异化中自己制造的贫困所致，为了摆脱自己的悲惨命运，无产阶级不得不通过消灭自身的处境来达到自己解放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消灭时刻制约着它而使其成为无产阶级、处于违反人性的生活条件中的对立面——富有者，也就不得不从根本上来消灭私有制，通过对私有制的颠覆达到扬弃自身解放自我的目的，所以他们成为了私有制内部否定的方面。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异化及其扬弃是马克思用来解释和解决当时现实问题的关键。工资、商业、价值、价格和货币等是私有制的进一步表现形式（蒲鲁东没有这样认为），但是这些形式不能充分反驳经济学家的观点，即把私有制关系看作是合乎人性的和合理的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因为它不断和自己的基本前提——私有制——发生矛盾。比如，工资好像是同消耗在产品上的劳动相称的份额。工资和资本的利润彼此本应该友好、互惠和合乎人性，但是最后却发现二者的关系是敌对的、相反的关系的。工资的数额本来应该由自由的工人和自由的资本家自由地协商确定，但是后来却发现，工人是被迫同意资本家规定的工资，而资本家被迫将工资压至

最低水平。强制代替了立约双方的自由。它认真地对待经济关系中合乎外观的东西，并将之和经济关系中违反人性的现实对立起来，使其脱离了这种伪善的外观而展现其违反人性的本质，将私有制描述为“合乎人性经济关系”的伪造者。私有制是异化（劳动）的结果，或者说，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导致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生，异化后的两个方面包含于私有制当中并相互对立与斗争，它们之间的相互斗争——肯定方面的坚持与否定方面的反对之间的斗争——又进而导致了这样一个后果，即否定方面为了扬弃因自我异化而导致的贫穷和类本质的丧失而反对私有制，最后的结果是私有制内部的因子导致了私有制自身的扬弃，最后达到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

如果说上述分析揭示了马克思对共产主义必然性的论证，那么还有一点需要进一步说明，那就是，马克思认为私有财产内部的内在矛盾必然导致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生。在以前的共产主义者那里，私有财产仅仅是作为一种消极的内容存在着，它的积极方面并没有被认识到，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论述恰恰解释了私有财产的积极方面，即私有财产内部的矛盾运动必然会导致共产主义运动。通过对私有制的两个对立面对异化进行的分析，也就从经济学和哲学双重角度分析了异化概念，并进而论证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然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历史必然会从私有财产这种状态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内在逻辑。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业已指出，“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26]。

但是，问题还不能仅仅止于此。我们还要追问，共产主义的实质应该是什么？根据马克思的回答，共产主义的最终价值目标是以人为本的。我们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看到，马克思认为：“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

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27]。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私有财产条件下，共产主义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获得证明：

首先是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马克思结束了以前共产主义者没有看到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分裂，真正实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统一。在以前的哲学理论中，尤其是青年黑格尔派（包括赫斯在内）的社会主义理论中，仅仅强调了精神的自由，即使自然在他们的视野之外。他们没有认识到，在整个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条件下，不但人所改造的自然界是对象化的，而且进行改造活动的工人也是对象化的。但是由于私有制的存在，人的对象化产物，这种体现人的类本质的东西，并没有在人身上得到体现，只有当人作为动物性的存在在进行生物性活动的时候，劳动者创造出来的对象物才被劳动者意识到，成为他们真正占有的内容。共产主义运动的目的就是要让资本主义条件下那种“异化了的占有”重新复归自身，让它们能够体现人的真正本质。也只有在这种条件下，人的“一切对象对他来说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对象成为他自身”^[28]。

其次，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结束了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和对立。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人与社会之间的二元对立是存在着的。即使是在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他们也往往倾向于把人淹没于社会之中，这更不用说德国哲学的国家观了——它是直接把满足个体的需要和意识融入了代表着整体的国家理性之中，而国家，在马克思看来完全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对于社会而言也是如此。在市民社会中，个人受制于市民社会中关于需要的体系，这导致的结果是人与社会的对立。但在马克思看来，“个体是社会存在物”，在个体与社会之间，在个体与普遍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个体是在社会中

的存在着的个体，社会是由个体组成的社会。个体在社会之中不一定必须采取完全相同的方式显现出来，它允许个体个性的存在，“他的生命形式……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马克思认可在社会中存在着的个人的独特性，但是也看到了他们作为人这个具有自由自觉意识的类的普遍性。只有这种独特性与普遍性结合起来，才是真正的人性的复归，而帮助实现这种复归的理论，才是“真正的共同体”^[29]。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能够通过消灭私有财产而帮助人实现对“财产”和“占有”的摆脱。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所有的人都因为这种占有关系而发生了异化，都偏离了自己的本质。当马克思提出这个社会日益分化为两大阶级的时候，既表示整个社会的丰富性被压制和掩盖，也标志者个体的总体性开始丧失。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仅仅是作为一种存在物，一种消极的存在。他们虽然是个体的，但是他们被迫无意识地都被归到了一个集合体中，而他们虽然处在同一个集合体（无产阶级）中，但是他们却又都作为个体生存性存在而不断彼此之间相互竞争。资本家亦然。在共产主义运动中，个体的特殊性和总体性都会得到充分展现。马克思认为，只有确认了自身的类意识和类属性，个体才能够“在自己的普遍性中作为思维着的存在物自为地存在着”，不仅如此，人在扬弃了私有财产之后，才能够真正复归自身，实现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而“正是这种特殊性使人成为个体，成为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同样，人也是总体”^[30]。

通过对共产主义的描述，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马克思的观点，共产主义应该是通过消灭私有制而创造出来的新的经济和社会关系，它作为一种现实的运动，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31]，通过共产主义，异化了的人得到了解放，通过共产主义，人的本性得到了回复，人本身得到了

全面发展，而人的丰富性也得到了充分展示。总之，正是共产主义使人成为了人。

共产主义除了是人自我复归的必然环节之外，我们还要看到它的适用范围，即它必须被理解为是人在对象世界内的演化环节。在精神领域，我们必须把无神论看成是与共产主义相对应的内容。如果说通过共产主义消灭了物质奴役的话，那么通过无神论就消灭了精神奴役。共产主义和无神论共同结束了人的前史，让人完全进入到了一种“人的自我活动和他的对象化的现实的、辩证的统一”世界之中。^[32]

【本章注释】

-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0页。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8页。
- [4] 杜威：《人的问题》，傅统先、邱椿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序”第3页。
- [5] 比雷：《论贫困》，转引自《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7页。
- [6] 比雷：《论贫困》，转引自《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4页。
- [7] 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II)，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196页。
-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8页。
-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5页。
-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4页。
-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3页。
- [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8页—第159页。
-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6页。

[14] 这里所讨论的虽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没有都出现，但是他们的思想确实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写作产生了影响。而且，如果我们把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核心的文本群综合考察，那么这里的论述就更会显得更为合理。

[15] 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74页。

[16] 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59页。

[17] 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243页。

[18] 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260页、第269页。

[19] Hess, Moses. 1961. *Philosophische und sozialistische Schriften, 1837-1850: eine Auswahl*, Berlin: Akademie-Verlag, pp. 364-365, 365. 上述论述主要参考了侯才教授的专著《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对马克思哲学本质的一种历史透视》一书的第四章“马克思与赫斯的社会主义（下）”。侯才：《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对马克思哲学本质的一种历史透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8页—第210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6页—第187页、第788页。

[21] Hess, Moses. 1961. *Philosophische und sozialistische Schriften, 1837-1850: eine Auswahl*, Berlin: Akademie-Verlag, pp. 200-206. 另参见侯才：《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对马克思哲学本质的一种历史透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8页—第210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6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页—第18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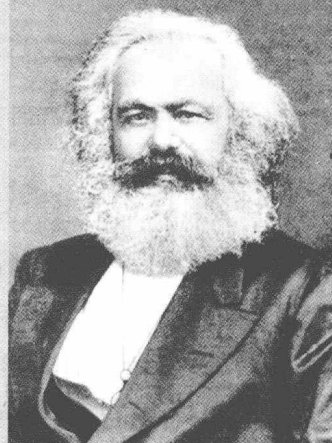
[2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1页。

[29] 上述引文出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8页。

[30] 上述引文出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8页。

[31] 上述引文出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7页。

[32] 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II)，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274页。



第五章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影响

我们可以说，马克思的绝大多数著作都可以算得上是经典。《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其导言、《论犹太人问题》、《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以及《资本论》和晚期的《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等，都展示着马克思追求真理、探求“历史之谜”的艰辛历程。马克思的伟大著作，不但让正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研究者，而且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都不得不面对马克思提出的问题域，迎接他提出来的挑战。但在马克思的诸多文本中，同样没有一本著作像《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样引起人们的广泛兴趣，对西方社会思想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本章就是要向大家展示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理论和实践中的地位 and 影响。

●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地位

对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来说，我们必须从两个角度来单独讨论。第一个角度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角度。通过这一角度的讨论，我们能够看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地位和作用，看到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这一文本的评价和定位。把握这一角度对于我们辩证理解和历史把握《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具有重要意义。第二个视角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客观而言，不管我们承认与否，西方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吸收马克思思想的基础上开始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进行批判的。

关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地位，我们将结合《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评价进行评定。但是这项工作也存在着巨大的难度，即由于它在马克思生前没有被发表出来，因此经典作家对这一文本的讨论是空白的。但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我们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评定必须是历史性的、阶段性的。因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正处于从青年黑格尔派向唯物史观的创立这一理论发展过程之中的，这导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内容充满了张力。如果无限放大《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合理思想内核，就可能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最高峰，进而贬低马克思晚期著作的重要性；如果只看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残留的青年黑格尔派痕迹，就会盲目地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价值肆意贬低，看不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要意义。

首先，《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揭示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实证研究，既对这种社会制度中出现的不合理现象进行了批判，也对这种社会制度的历史合理性进行了肯定。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无产阶级的论述让人们认识到无产阶级的悲惨现状，了解到了他们被资本家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但也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这种不合理现象恰恰蕴含着巨大的社会革命危机。这种研究实际上奠定了马克思今后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基调，即不仅仅停留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批判上，而且还要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来论述这种现象必然会被更好的社会制度取代的历史必然性。但是也要看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不利现象和必然灭亡的研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与晚期的《资本论》中还是存在着一些差距和不合理之处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不公平现象的揭示和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论述还有

相当部分内容是从哲学论证的角度进行的，这种历史的必然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自我意识自身发展的必然性；而《资本论》中通过对资本有机构成的分析则无疑更科学合理，更具有说服力。

其次，《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们知道，异化劳动作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重要内容之一，一般被认为它仍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因为这一思想主要是从人的类本质角度对异化劳动进行批判的，而类本质无疑是从费尔巴哈那里继承过来的一个概念。对于历史唯物主义而言，这一概念的形而上学性质太浓厚了。而且，既然是异化劳动，那么就不得不强调它的异己性。但在马克思的成熟中，劳动的这种道德属性是不考虑在内的，它只是“现实的活动，是人们处在历史发展中、具有一定形式的生产劳动”^[1]。这种观点是非常客观的、很准确的。但是，“异化劳动”毕竟是马克思走向唯物史观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因此它在这一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应该受到重视和重新分析评估。基于此，有许多学者认为，异化劳动实际上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实际上马克思通过异化劳动和私有制关系的阐释，通过异化劳动诸方面相互关系的论述，向我们展示了生产活动的内在矛盾及其相互关系。因此，我们有理由把它看作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原理的最初表述，它以萌芽的形式内含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最重要的原理”^[2]。而且，在分析私有财产、异化劳动与人的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时，马克思提出了“要从人的本质、能力的自身发展中寻求劳动异化的答案。这无异于要求从生产力的自身发展中寻求问题的答案”^[3]。

再次，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了初步阐述。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上，阐述了哲学基本问题，对存在与意识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述，既对一些唯心主义进行了批驳，也对机械唯物主义进行

扬弃；他创立了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即在反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这与费尔巴哈的直观感觉论即消极的反映论进行了区分，这样一来，马克思就在实践层面上把认识论与历史观统一了起来。当然，对于革命运动与经济运动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也进行了唯物主义的说明。这些都表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奠定了基础，为开始科学地论证共产主义准备了理论前提。

可以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这些论述都促使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者不得不重视这一文本，对它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客观地位作出科学评价。南斯拉夫的弗兰茨基充分肯定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价值和意义：“马克思的这部手稿最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一种新的天才的关于世界和人的观点已经成熟了。虽然某些明确的论断还没有提出来，但是考察这个根本问题的基础和范围已经牢固地奠定了。以后的著作只是说明，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彻底遵循这些基本思想，把握整个人类的历史存在，更精确地表述各种结论。”^[4]真正科学的评价绝对不会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这是不足取的。国内学者同样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地位给予了充分的认肯，“如果我们把《资本论》看作是马克思理论探索之大成，那么，《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是它的伊始和雏形。在这部天才思想闪烁的著作中，马克思通过对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的解剖，形成了在科学世界观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异化劳动理论，找到了生产劳动这把理解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钥匙，这就使他能够站在一个更高的起点上，开始了对科学世界观各个方面的初步探索，取得了重要的理论成果”^[5]。

当然，我们还要注意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大量存在的德国古典哲学的术语，尤其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术语。这些术语的

使用一方面说明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论证是用他自己已有的知识体系来思考私有财产、劳动、拥有以及货币（金钱）等国民经济学中的重要问题，另一方面，这也说明马克思的思想仍处在一个急速的变动期，这种过渡时期的思想往往是新旧杂陈的，甚至出现这样的情况——马克思所使用的术语与赫斯等青年黑格尔派完全一样，但在具体内涵上已经发生了巨大差异，因而在阅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过程中，要注意分析马克思对这些术语的发展。这些概念和术语内涵在马克思晚期著作中的变化在一定意义上也说明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历史性和阶段性。

●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异化”为中心

通过分析看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影响不仅仅限制在马克思主义学界，而且整个西方学术界都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给予了极大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弗洛姆的《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阿尔都塞的《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施密特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等都或多或少涉及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我们甚至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地之一。但如果要谈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最感兴趣的概念和内容，毫无疑问“异化”是其中之一。

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异化的论述，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说明，即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6]

（一）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

当异化这一概念被提出之后，它就不再仅仅和劳动联姻了。在

马克思那里，“异化”意味着一种异己性和对主体的压迫。但是随着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和发展，它开始有了一种非常态的含义，意味着一种正常社会模式的失范，一种对人的压迫和奴役。正是它包含的这种对立性和矛盾性，使得人们越来越从这一角度来分析当下社会所存在的痼疾。马克思从“劳动的异化”出发分析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当一种新型的垄断资本主义取代了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以后，它也发展了自己的新的剥削和压迫形式”，而且这种“异化”的形式出现了一种普遍化倾向，它把“社会生活和社会存在的总体性当作自己的统治对象，把一切主观性和活动都变成物化的客观性，把一切人类主体都变成他们自己的异化存在的消极旁观者”^[7]。

在马克思的理论下最早对异化理论进行研究的是卢卡奇。虽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全文发表是在1932年，但卢卡奇在1923年出版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就对“物化”（在卢卡奇这里与异化几乎可以等同使用）进行了详细的论述，用这一概念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和本质特征进行了批判。

卢卡奇认为：“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的产物，必然隶属于它的创造者的生存模式。这一生存模式就是非人性和物化”^[8]。于是物化就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特征。进而卢卡奇认为：“人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劳动，成为客观的，独立于自己的某种东西，成为借助于与人相对应的某种自发运动而控制了人的某种东西。”^[9]对于物化，如果从客观方面看，它导致了人不能控制的物的世界，这种物的关系就是一种商品所充斥的市场关系；从主观方面看，人自己的活动变成了客观的、独立于他的物的商品系统，反过来控制或奴役劳动者。显然，卢卡奇认为在这一世界中所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变成了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人所创造的这种关系是与自身相对立的。而且，这种物化现象是一种普遍的人们不能逃离的社会现实。

物化呈现出来了一些特征，那就是人和社会生活的碎片化、现实生活的机械化以及无产阶级在这一关系中的客体化（也就是他们主体性丧失）。之所以是碎片化，是因为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人们逐渐丧失了对整体性的判断和对社会的批判；由于社会关系的碎片化以及人的被动性，使得人们丧失了对理想的追求、忽视了对未来向往，人们在整个社会及其中只不过是一个螺丝钉，对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而言，每个人都是被动的承受者。就是这种被动性，使得人们成了机器，成了一个丧失了主体性和创造性的人。这种物化现象对于人、社会和历史的负面意义在于，它或者让人们沉迷于局部和当下，不是把改造的目标放在社会，而放在个人身上；或者盲目相信主体的力量，非理性地表现自己。

对于物化现象，卢卡奇提出了自己的解决之道。他认为，要克服无产阶级的异化状况，就要唤醒他们的主动性，通过主体的觉醒来让他们对总体性产生一种渴望。有了总体性和主体性，人们就能够生活的更有意义。至于什么是总体性，卢卡奇认为，它实质上就是一种领导权。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社会是按照需要的体系和利益的需要来组织整个社会的，而资本家控制着整个社会的安排设计，因而也就控制着社会整体，控制着社会的领导权。无产阶级克服物化意识，改造资本主义社会，就必须去获得领导权，渴望整体性。

（二）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作为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也大量讨论了异化问题。在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代表列斐伏尔那里，异化理论是他一生的理论方向。他把异化看成了哲学的核心概念，并把马克思早期的异化思想看作是理论生长点。在列斐伏尔看来，劳动就是异化，由于劳动是人的本质，社会的主体又是人，而异化又意味着矛盾，所以整个社

会就是充斥着种种异化的社会，是一种全面的异化。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不管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城乡之间都产生了一种对峙关系，这些对峙关系实际上是人性内部的矛盾和分裂，也是一种异化。对于整个世界而言，由于它是作为劳动的客体出现的，能够为劳动主体——人所把握和控制；如果人们不能掌握和改造这一客体，那么它也会与人发生“异化”。尤其是，随着机器大工业时代的到来，社会和人的异化状态也达到了顶点。也就是说，异化已经表现出一种“多面性和无处不在性”，表现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异化作为整个社会的普遍性特征，不仅仅包含压迫、剥削等传统内容，而且还涉及人们的无意义感觉。列斐伏尔认为：“异化的定义不仅包括人在外部物质世界或不定形的主体性中迷失自我，还包括个体在主体化和客体化过程中的分裂，其统一性被毁坏。”^[10]在哲学上，主体化和外在化就是异化这枚硬币的两面。这种异化是人的力量的一种外在化表现，但是它的存在造成了个体的自我剥夺、分裂和疏远。在这种分裂的异化关系中，人与自己的劳动产品是一种错乱和颠倒的关系，不是人驾驭自己的创造物，而是相反。

这种异化已成为人的基本的生存矛盾，它表现在自然与社会、个人与社会、理性与本能以及意识与无意识之间。它如同一张巨大无比的网，笼罩着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任何人都无法逃避。“异化就这样扩展到全部生活，任何个人都无法摆脱这种异化。当他力图摆脱这种异化的时候，他就自我孤立起来，这正是异化的尖锐形式。”^[11]总之，异化成了人类实践的基本结构。而且，由于每个人的行为都由原始自发的秩序、理性的组织结构和压抑的拜物教系统三个发展阶段组成，据此，在经济学上劳动分工导致了工人的被剥削，在政治学上有效的管理最终腐化成国家（政党）专制的工具，在哲学上思想的阐明最终变成严酷的意识形态和权力统治的工具。

但是，列斐伏尔对马克思的异化范畴的使用并不是一种简单套

用，而是在马克思基础上予以发展。他在肯定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的基础上把异理解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自身的矛盾及其发展的一个方面，这就与黑格尔的异化概念发生了质的差别，不再把异化（绝对精神的外化）理解为矛盾的基础和条件。列斐伏尔认为，与黑格尔不同的是，马克思的异化概念是把黑格尔的神秘主义的异化理论包括在了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之中，具有了合理性的一面；而最大的差别在于，黑格尔是用神秘主义的异化来解释矛盾，解释辩证法，马克思则相反，他对异化理论的改造是用辩证法来解释异化理论。其次，列斐伏尔提出，异化理论并没有随着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而被抛弃，毋宁说，它是用晚期的成熟的经济理论来论证和充实异化理论。马克思早期的异化理论并不是像他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样来抽象地理解和运用异化范畴，认为他们已经败坏了异化的理论力量，使之成为了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相反，它只是内容变得更加丰富、更加具体和多样化。列斐伏尔认为应该从具体的社会关系入手理解异化，考察现代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哲学家们无权把哲学领域孤立起来，无权在异化的或被异化的现实情况之外来研究异化。在确定了一个概念和它的普遍意义后，便应当过渡到其他一些确定的领域——政治经济学、社会学，而且特别要把概念和日常生活的情况结合起来”^[12]。这样一来，抽象的异化概念就通过将之纳入社会学而具体化。毫无疑问，列斐伏尔正是沿着马克思的思想历程对异化理论进行改造和运用的，在一定程度上准确地把握住了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生长点，契合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新方向，即日益把理论关切点从经济领域转向上层建筑领域（文化、语言、日常生活和心理）。但是，“列斐伏尔的异化理论带有明显的人本主义性质，侧重于社会一文化的异化，用人的总体异化取代劳动异化，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去分析现代社会产生的新的异化形式。马克思认为异化是人类社会

的客观现象和过程，异化有社会异化和自我异化两大类，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是统一的客观历史过程，是异化的不同表现形式。自我异化即人同自己的本质、生命活动（自由自觉的劳动）的异化，是与社会异化不可分的。马克思认为分工和私有制是劳动异化的根源，列斐伏尔则从人的生物本能、欲望出发，强调人的自然性是经常重新发生的异化、人的内在矛盾的深刻根源。异化贯穿着人的一生，劳动分工造成了人的异化、碎片化和片面发展，异化是从自然的分工向自发的分工转变过程中产生的，交往是异化产生和普遍化的因素，私有制和异化相互强化着对方，互为因果”^[13]。

对于异化，萨特也从存在主义角度进行了论证。“他人就是地狱”，有诸多他人构成的社会束缚着人的个性的发展，每个人都把他人看作是客体 and 对象，并力图让自己超越这种主客体关系，所以人不可避免地进入到一种孤独的个人生存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们竭力的自我掩饰和自我欺骗，否认自己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选择以规避自己应承担的责任；而且人还竭力逃脱被别人“注视”，因为在他人的注视下，个体所呈现的并不是人的自有本质，而是一种被他人看到的规定性。所以这种“自我欺骗”和被他人“注视”的状态就是一种异化的状态。在《辩证理性批判》中，萨特根据历史发展中所呈现出来的“匮乏”现象来理解异化，认为在这种匮乏的状态下，人与人之间不可能实现合乎人性的、平等互利的关系，他人对自己来说永远是一种威胁，而与他人相遇对人的本性而言时刻会面临异化的危险。

马尔库塞是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也与法兰克福学派关系密切。基于这双重身份，他对异化的论述是从多个角度进行的，既有从人的潜意识角度对异化的解释，也有从工具理性批判的角度对异化的批判。他首先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了人们对当代社会制度的接受，成了一种驯服的动物，因为资本主义的工

业文明满足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但这让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全面的异化：从科技到文化体系，从劳动到消费领域，从人的思想到社会心理结构，甚至从人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都出现了严重的异化。从技术理性的角度来看，马尔库塞认为生产的机械化、作业的流水线化、产品的标准化以及管理的科学化，好像都是科学技术给人的生活 and 生命带来了好处，实际上，它是用技术来压制人性，将人等同为机器，资本主义的进步法则被浓缩为这样一个公式，即“技术进步 = 社会财富的增长（社会生产总值的增长）= 奴役的加强”^[14]。比如，从工人与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来看，马尔库塞认为，在新的条件下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强迫工人去消费劳动产品，工人成了消费产品的奴隶。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已经不再是满足生理意义上的人类需求，而是一种奢侈型的消费需求。这就导致人们的消费总是被预先决定的，人们已经失去了判断能力，他们的需求在大众心理学的潜在机制下完全为当下的社会制度所同化。人们的需求已经不再是生理上的需求。

因此，马尔库塞认为，由于产品的极大丰富，工人已经不再思考自身的异化问题，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讲的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也就不存在了。也正是由于社会财富的增加，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出现了同化的趋势，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融合为一体，这让工人阶级失去了反抗的动力，他们的革命动力消失了，因此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肯定的力量，而不是否定的因素。马尔库塞正是从科技的异化、意识形态的异化、人的异化等方面，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消极影响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批判，试图从西方社会高度富裕和高度自由的外表下揭示出它对个人的统治和压抑。

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另外一个代表是弗洛姆，他从心理学的角度对异化进行了分析。弗洛姆根据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认为，人的本性就是人的自我能动性，人的存在就

是人通过自己的能动的创造，充分发挥内在潜能从而达到自我实现的过程，人的本质就是对人的内在潜能的肯定与发挥。在马尔库塞看来，人的自我能动性实际上就是劳动。这样一来，马尔库塞的人的自我能动性和马克思的劳动就具有了同等地位，即都作为人的本性而出现，只不过是人性的不同表现。“劳动是人的自我表现，是他的个人的体力和智力的表现。”^[15]在弗洛姆看来，马克思把劳动当作是人的本性就是为了让人们全面发展和享受。“在这一真正的活动过程中，人使自己得到了发展，变成人自身；劳动不仅是达到目的即产品的手段，而且就是目的本身，他是人的能力的有意义的表现”^[16]。

弗洛姆明确指出，异化就是对人的生产性潜能的否定。本应该成为自我表现的生产劳动，反而成了统治人的异己力量，而这种异己力量对个体而言就是一种心理体验，“异化（或‘疏远化’）意味着人在他把握世界的时候并没有觉得自己是发生作用的行动者，而是觉得世界（自然界、他人和他自己）对他来说是陌生的。……异化主要是人作为与客体相分离的主体被动地、接受地体验世界和他自身”^[17]。因此，通过对作为人的本性的自由劳动的否定，异化否定了人的生产性潜能。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人们“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18]。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

不管是马克思对异化理论的论述，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异化理论的展开，都是对不同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不正常状态的分析。更为重要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把心理学、社会学以及语言学等内容引入到对异化理论的研究，深入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的新特征和新现象、新问题，对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和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

基础。当然，他们对马克思的抽象改造也部分歪曲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本真含义。

（三）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也对异化问题进行了论述。在这里，我们分析一下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

对于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言，马克思的文本应该用一种科学的态度进行解读，只有在真正把握马克思原著的基础上，才能把握马克思的本真精神。因此，像科莱蒂等人在分析马克思的思想时，注重马克思著作的原创性，尽可能分析马克思与黑格尔等人思想的差异。对于哲学基本问题而言，科莱蒂就认为，在黑格尔那里，思维和存在之间的关系是同一的，但在马克思那里，二者则是异质性的。在论证这种异质性的时候，科莱蒂认为，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为这种异质性提供了证明，因为，如果思维和存在是同一的，那么人们是按照自己的理性合理地创造出来的东西是不可能压抑主体自身的，也就是说不可能产生异化。科莱蒂进而认为，正是马克思看到了思维与存在的异质性，并用这一思想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所以才能够提出异化的概念。

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另外一个比较有影响的流派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这一学派强调通过对马克思的文本分析来厘清马克思著作中广泛存在的抽象概念。“异化”就是这样一个概念。在埃尔斯特《理解马克思》一书中，埃尔斯特认为异化概念是一个贯穿马克思一生的术语。但是这个概念的诸多要素却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但综合来看，异化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它的第一个概念表示马克思所谓的“自我实现”的缺乏，有些学者将之称为精神异化；而第二个概念则是指“人的产品对人这个创造者所拥有的权力”^[19]。

对于精神异化，埃尔斯特认为可以理解为意义感的匮乏，或者

说是意义的匮乏。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是这样论述的：工人在劳动中“感到不自在……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这在埃尔斯特看来就是一种精神异化，但是马克思及其后继者和评论者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而只是在整体意义上来讨论。对于第二种异化，埃尔斯特认为就是指一种社会异化。这种异化发生在经济领域，而且在这一领域的各个环节——比如生产环节、消费环节等。

当然，埃尔斯特对异化的分析还不仅仅局限于对概念的演绎分析，而且还在演绎的基础上对二者进行归纳。比如，当他把经济异化分解为经济过程中诸多环节的异化后，埃尔斯特就开始研究消费对象与工人的异化以及它与精神异化的关系，只不过，这些异化概念已经不仅仅局限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而已。^[20]

当然，异化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也得到了发展和论述。比如德波的景观社会实际上也是对异化理论的运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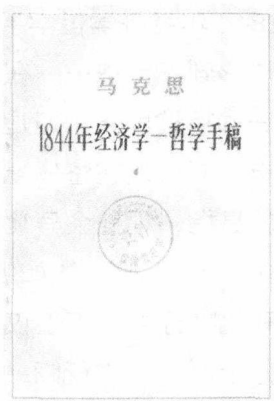
根据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异化”概念的论述，我们知道《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西方思想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三 | 一个经典的文本和一个永远的话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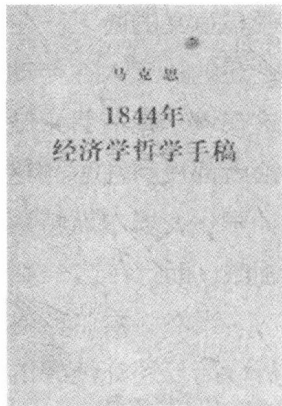
作为一个没有正式出版的文本，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于西方思想的影响还不仅仅局限在“异化”这个概念上。实际上，就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道主义思想也同样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巨大影响。比如在西方学术界广泛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解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根据出发点和研究方法的差异，人们一般倾向于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区分为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种差异就肇始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应该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批判分析，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说明如何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英文版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文版早期单行本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单行本

但马克思在论证过程中，有大量的篇幅集中讨论了“人的问题”，讨论了共产主义与人道主义之间的关系，因此造成了上述争论。搁置争论不议，我们看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确实引起了人们的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并促使他们用马克思的观点来分析社会，批判现实。

西方一些以研究马克思的文本为主业的著名学者也同样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产生了兴趣，比如郎兹胡特、迈耶尔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早期著作》中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它“在某种意义上是马克思的最重要的著作”，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关节点。比利时的德曼也在《新发现的马克思》中认为，“马克思的任何一部著作，都不像这部著作这样清楚地展示出隐藏在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后面的人道主义主题”^[21]。

此外，《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影响还不仅仅局限在西方世界，即使是东方的日本，也有大量学者对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产生了兴趣。像广松涉、望月青司和山之内靖等人都在自己的研究中广泛讨论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主题，

通过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分析梳理出了很多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诸多命题以及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之间的关系。应该说，即使我们不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看作是马克思的一个成熟文本，我们也应该把它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西方传统中的一个经典文本。

与这个经典文本相联系的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异化”。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作出了不同的解释，如果说这种理论的来源是多元的，那么这个理论的影响也是多元的。学者眼中的异化，已经不仅仅是那个简单的劳动异化，人们开始将之推广到了整个社会生活之中。

随着对这个经典的文本和永恒话题的研究地不断深入，会有更多的学者受到启发，更多的睿智思想从这个文本中涌流出来，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乃至方方面面。

【本章注释】

[1] 黄楠森：《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26页—第127页。

[2] 侯才：《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对马克思哲学本质的一种历史透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5页—第176页。

[3] 侯才：《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对马克思哲学本质的一种历史透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6页。

[4] 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5页。

[5] 黄楠森、庄福龄、林利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1卷，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363页。

[6] 严格意义上，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可以算是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支流，但是基于早期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卢卡奇地位的独特性，我们在论述的时候决定将之单独讨论。

[7] 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126页。

[8] Lukacs, G. 1971.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 MIT. p.76.

[9] Lukacs, G. 1971.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 MIT. p.87.

[10] Lefebvre, H. 1968. *The Sociology of Marx*. New York: Random House. p.10.

[11] 《西方学者论〈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96页。

[12] Lefebvre, H. 2002.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ume II*.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p.94.

[13] 吴宁、蔡曙光：“列斐伏尔的异化理论及其渊源”，《重庆社会科学》2007年第11期。

[14] Marcuse, H. 1972. *Counterrevolution and Revolt*. Boston: Beacon Press. p. 4.

[15] 《西方学者论〈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4页。

[16] 《西方学者论〈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4页—第55页。

[17] 《西方学者论〈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6页—第57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9页。弗洛姆实际上在这里通过把马克思原文中的“工人”替换为“人”这一概念置换，实现了从马克思“阶级批判”向“抽象的、一般的”人的批判。

[19] Elster, Jon. 1985. *Making sense of Marx*,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74.

[20] Elster, Jon. 1985. *Making sense of Marx*,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100-107.

[21] 德曼：《新发现的马克思》，转引自《西方学者论〈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编译说明”第 3 页。

参考文献

中文部分：

-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 [4] 奥尔曼：《异化：马克思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概念》，王贵贤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 [5] 奥伊则尔曼：《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及其解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 [6] 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 [7] 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 [8] 哈贝马斯：《理论与实践》，郭官义、李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 [9]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 [10] 韩学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论析》，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 [11]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夏镇平、宋建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
- [12] 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I—III卷），三联书店1963年版。
- [13] 王若水：“异化这个译名”，《读书》2000年第7期。
- [14] 王若水：《在哲学战线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 [15] 《西方学者论〈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 [16]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 [17]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18] 俞吾金、陈学明主编：《国外马克思主义新版·西方马克思主义卷》（上、下册），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英文部分：

[1] Anderson, P. 1976. *Consideration on the Western Marxism*, London: NLB.

[2] Craig Edward (ed.),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Vol. 6.

[3] Elster, Jon. 1985. *Making sense of Marx*,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 Fromm, E. 1956. *Escape from freedom*. New York: Holt.

[5] Fromm, E. 1980. *Beyond the chains of illusion: my encounter with Marx and Freud*, New York: Continuum.

[6] Fromm, E. 1947. *Man for himself: an inquiry into the psychology of ethics*. New York: Rinehart.

[7] Fromm, E. 1961. *Marx's concept of man*. New York, F. Ungar Pub. Co.

[8] Gramsci, A. 1995. *Further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9] Larrain, J. 1986. *A re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oston: G. Allen & Unwin.

[10] Lefebvre, H. 1969. *The Sociology of Marx*, New York: Random House.

[11] Lefebvre, Henri. 2002.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ume II*.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2] Lukacs, G. 1971.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 MIT.

[13] Marcuse, H. 1972. *Counterrevolution and Revolt*. Boston: Beacon Press.

[14] Marcuse, H. 1956. *Eros and civilization: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Freud*,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o, Beacon Press.

[15] Marcuse, H. 1960. *Reason and revolution: Hegel and the rise of social theory*. Boston: Beacon Press.

[16] Merleau-Ponty, M. 1968. *Sense and Non-sense*.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7] Merleau-Ponty, M. 1973. *Adventures of the dialectic*. Evanston, [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8] Ollman, 1976. *Alienation: Marx's conception of man in capitalist society*.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第一章 马克思的早期思想发展

- 一、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
- 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思想来源

第二章《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文本结构及内容梗概

- 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文献学研究
- 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基本内容

第三章“异化”与私有财产

- 一、“异化”概念的源流
- 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
- 三、《神圣家族》中的异化及资本家的异化
- 四、“异化”与私有财产之关系

第四章 共产主义与人的解放

- 一、私有财产与人的问题
- 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与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
- 三、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之谜的解答”

第五章《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影响

- 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地位
- 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异化”为中心
- 三、一个经典的文本和一个永远的话题

参考文献